

第二版前言

苏联共产党第七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一些重要問題以及过去一年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發生的許多变化，使我有必要在新版时把一九五五年春天所做的这个报告作一些修改。但事实上不容許我等很长时间以后再徹底修改这个报告，所以原文的絕大部份只好保留下來。因此我只限于刪除了原文中包含的錯誤論点，即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必然尖銳化的論点，在脚注中指出所引著作的最新版本。这样，这个报告的第二版就可以滿足一些迫切的要求。

弗·厄斯納

1956年7月31日 柏林

统一书号：4002·104
定 价： 0.26 元

目 录

第二版前言

过渡时期的必然性.....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特点和阶段.....	1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概况和经济规律 的作用.....	27
经济和思想.....	85

過渡時期的必然性

德意志民族最偉大的兒子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真正科學的政治經濟學，論証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客觀、歷史的必然性。他們科學地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完備形式決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產生，因為構成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的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是其中不可克服的障礙。

從奴隶占有制的生產方式過渡到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從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時，新的經濟形式都可能在舊的生產方式內部形成，而事實也是如此，因為這三種社會經濟結構是屬於同一類型的。它們三者都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僅僅是人剝削人的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從經濟上看來，一種結構可以從另一種結構中生長出來。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把政權奪到資產階級手里，使得政治統治形式同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相適應。

從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是根本不同的。與資本主義恰恰相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基礎的。它不是以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而是消灭一切人剝削人的形式。這種經濟形式在質上是全新的，同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是對抗的，因此只有通過革命，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它才有發展的可能。

当然，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資本主義生產愈發展，就給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創造了愈多的物質前提。同時這種發展也就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的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日益成為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日益迫切地要求解決這個矛盾，也就是取消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有消滅這種占有形式，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才能發展，剝削階級和人剝削人的現象才会消滅，然後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特徵的階級對抗才会消失。

這種社會生產關係的變革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它包括一整個歷史時代，我們把它叫做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馬克思在對哥達綱領的批評意見中寫道：

“在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橫着一個從前者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④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必要前提就是要勝利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工人階級政權。只有奪取政權以後，工人階級才能使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發揮作用，才能以社會主義所有制代替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因此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說：

④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蘇聯外語文書籍出版社中文版，第三十一頁。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开始于無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建成。”[⊖]

工人阶级的政权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巩固联盟的基础上的。农民群众同样渴望从资本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通过反对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艰苦的阶级斗争，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無产阶级国家政权就创造了新的经济条件，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由这种新的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無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把大工业、铁路、银行、对外贸易等变为社会所有，即国家所有的手段，掌握了经济命脉。

無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工人阶级利用它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保卫国家，把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国家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只有依靠它，工人阶级才能着手解决过渡时期的任务，才能胜利完成这些任务，因此保卫和巩固工农政权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经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并且胜利地结束了这个时期。这个国家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历史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到现在为止，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社会学说得到这样的证明。如果在無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胜利地发展了一

⊖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1页。

百多年后的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中叶，卡尔斯卢埃有一帮法官和檢察官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送上法庭的話，那么他們只是証明，历史早已給他們的社会制度宣告了死刑。

苏联人民在过渡时期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經驗，他們所創造的經濟領導的新形式，他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探寻的，并且胜利地走过了的新道路，这一切都成了进步人类的公共財产。在苏联的政治經濟学教科書里，这些新事物第一次被总结起来，概括起来，并使之系統化。因此这本教科書对于所有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国家，也对于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了研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宝贵的基本材料和解决过渡时期各项任务的实际指南。

过渡时期的特色是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已經說明，过渡时期是以新与旧的暂时并存为其特征的。在这里，新与旧的比例在过渡期初期当然与过渡时期末期迥然不同。在經濟方面，过渡时期的特征是存在各种不同的經濟形式，最主要的有下列三种：

一、社会主义經濟

二、小商品經濟

三、资本主义經濟

同这些經濟形式相适应，在过渡时期还有各种阶级。主要的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阶级，此外还有资产阶级。他們依賴于現存的、资本主义的工業、运输業、商業和農業企業，并且依靠在其他国家占着統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支持。

因为無产阶级政权是完成过渡时期各项任务的最重要的工具，所以过渡时期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要巩固作为無

产阶级政权基础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

过渡时期最重要的经济任务是在所有经济部门建立、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任务只有不断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决定这一斗争的结果。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苏联教科书中这样确定——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前者是新生的，但是开始还弱，未来是属于它的；后者是被推翻了的，但是起初还强，在小商品生产中有它的根源，它是过去的东西。解决这个矛盾的速度要看劳动人民是不是把社会主义建设看做自己的事情。

解决过渡时期任务的要点在于主要用经济手段达到变革的目的，所以无产阶级政权在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利用经济政策解决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同农业经济以及其他经济形式之间的经济联系。由于小农经济的商品性质决定，通过买卖的交换就成为这种经济联系的适当形式，因此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商业结合就成为经济的必然性。但是商业是以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为前提的。一九一八年列宁就已经制定了适合于利用商业和货币流通的经济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以新经济政策的名称载入史册。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在一九二一年代替了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曾经是必要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缘故。战时共产主义是以余粮收集制、禁止贸易和工业中的实物供应制为基础的。与此相反，新经济政策是：

“利用市场、商业、货币流通来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①

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超过税额的农产品可以自

由买卖。商業成为社会主义工業和小农經濟之間的最重要的紐帶。向新經濟政策过渡的同时，在工業方面也由实物供应制轉变为买卖制，因此國营企營就有必要实行經濟核算制。新經濟政策的本質是工人階級和劳动农民的經濟聯盟，是利用經濟杠杆，自觉地运用客观經濟規律广泛地代替經濟領導上的行政方法来建設社会主义。新經濟政策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运用社会主义客观經濟規律的方法，因此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理由指出，苏联实行的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任何一个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行动指南。事实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也正是根据列寧所制定的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进行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是根据这些基本原则來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新經濟政策是工农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的具有特色的經濟政策。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意味着过渡时期的結束及新經濟政策的結束。

由于無产阶级政权創造了新的經濟条件，因而資本主义客观經濟規律就在过渡时期的过程中失去了它的作用，而新的社会主义經濟規律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由于正确地执行新經濟政策，这种規律就日益扩大它的作用范围，成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統治地位的規律，而資本主义經濟規律却終于退出舞台。

过渡时期的特点是存在各种不同的經濟形式，同样，在过渡时期中存在不同的經濟規律——資本主义規律和社会主义規律——也是过渡时期的特征。因此討論过渡时期的經濟規律(常常有人这样做)是不对的。过渡时期沒有它自

⊕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7頁。

己的規律，它是社会主义經濟規律排除和代替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历史时期，同样，討論过渡时期的特殊基础也是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教科書上說：“在过渡时期內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因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时期。这斗争是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下进行的。在斗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吸引了愈来愈广大的阶层的人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設。同劳动农民結成联盟的工人阶级利用它手中的国家政权、经济命脉和它所掌握的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規律，以保証生产力的發展（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所需要的），巩固并扩大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使得社会主义經濟規律的活动范围日益广阔。

随着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形成，在社会主义成分中开始起作用的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也就产生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着经济命脉，因而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就逐渐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發展發生影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失去了效力，剩余价值規律只在资本主义成分中还起作用，这种作用愈来愈受到限制。

同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無政府状态的規律相对的，产生了国民经济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并且开始逐渐發生作用。这个規律使得有計劃的經濟領導和各个經濟部門之間有計劃地形成正确的比例成为必要和可能。这个規律的作用是随着社会主义經濟成分的壮大和扩展而扩大的。

资本主义的工資規律在社会主义經濟成分中失去了作

⊖ “政治经济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1頁。

用，按勞分配的經濟規律代替了它的位置。

由于經濟狀況中的這些改變，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一些條件在過渡時期中也起了根本的變化，而價值規律的繼續存在是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繼續存在為條件的。但是價值規律的無政府狀態的作用日益受到限制，它受社會主義的某些條件所制約，並且變為社會主義經濟領導的一個重要工具。

每個向社會主義邁進的國家大體上都會經過這兒勾畫了一個大致輪廓的蘇聯過渡時期的發展過程。可是每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二階段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都表明，除去它們的民族特点之外，同蘇聯的發展相比還有幾點重要的區別，這些不同點對於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是非常有利的。這些不同點是：

一、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干涉和反革命的自衛軍分子挑起的內戰，蘇聯被迫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這一政策使得蘇聯能夠战胜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一九二一年春天戰勝干涉者和反革命分子以後過渡到新經濟政策，因此這政策本身就含有退却的因素。關於這一點，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科書中說：

“戰時共產主義是用衝擊手段，用正面進攻手段攻破城鄉資本主義成分的嘗試。在實行這個進攻時，黨向前面跑得太遠，有脫離自己根據地的危險。列寧現在主張稍許後退一點，暫時退到更接近於自己後方的地方去，由衝擊手段轉到較為長期的包圍敵人保衛的方法，以便積蓄起力量後，再去開始進攻。”¹⁾ 新經濟政策執行一年以後，列寧就宣布說，退却結束了。

由于苏联的支持，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沒有發生外國干涉戰爭，因而這些國家沒有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所以這些國家運用新經濟政策的原則也就不表示一種退却的因素，而是从最初起，新經濟政策就是無產階級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這種政策的特點在第一個階段已經通過向資本主義陣地進行經濟上的攻擊表明出來了。

二、蘇聯是第一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它仍然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蘇聯人民承擔了非常艰巨的任務——在資本主義的全面包圍下，在一個國家里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無論在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面，或者在農業集體化方面，它都得不到外界的任何支援。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國內敵人作艱苦的鬥爭，在國外的經常威脅之下，蘇聯人民在他們的光榮的共產黨領導下完成了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事業。

今天的形勢是多麼不同啊！在完成了社會主義建設、開始逐漸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蘇聯領導之下，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差不多擁有十億人口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這個陣營里的每一個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中，都得到了蘇聯以及這個陣營里的其他國家的兄弟般的援助和支持。這個陣營組成了世界民主市場，這個市場對於社會主義陣營的所有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今天任何一個國家都不需要單獨建設社會主義了，它可以依靠社會主義陣營的巨大力量，特別是依靠社會主義蘇聯的無私的援助。

三、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走上從未有人走過的社會主

⊕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316頁。

义發展道路的国家。虽然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已經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路綫，可是要緊的是必須在苏联过渡时期的現實条件下，确定恢复国家經濟、社会主义工業化、农業集体化、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質福利、实行文化革命的具体措施。这首先是列寧的不朽功績，他創立了过渡时期的理論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經濟學，斯大林写了一系列新的經濟科学著作，进一步發展了这种学說。今天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讀到关于从資本主義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国民經濟体系的綜合叙述，完全是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积累的丰富經驗的科学概括。

这就給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減少了許多困难。今天我們不必冲到沒有人探究过的領域里去，我們不必去寻找在过渡时期中产生的一些新的經濟規律，不必探究它們的作用——这一切苏联人已經給我們做了。我們的任务是徹底研究这些經驗，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并且學習在我們的条件下，正确地运用这些經驗。我決不是說，这是一个輕而易举的任务，我們大家都認識到这件任务是困难而复杂的。虽然如此，同苏联人民和他們的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所必須解决的任务比較起来，我們的任务容易得多了。苏联人解决了这些任务，同时也給各国人民完成了極有价值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准备工作。对于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是如此。

四、最后，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軍事形势同苏联在过渡时期的軍事形势也有所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存在一天，就沒有一个国家，特別是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保証不受軍事进攻。一九一八和一九四一年，帝国主义分子向苏联發动了进攻，同样，今天他們还在做梦，想用軍事力量阻止

和扭轉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一九五五年二月底，波恩聯邦議會批准了巴黎戰爭條約，這就表明帝國主義陣營是多么嚴重地威脅着我們的安全。只要世界還分成兩個陣營，那麼保衛社會主義成果就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一項特殊任務。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和政府公開宣布，他們充分認識到這件任務，並且要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衛我們和平建設的成果。

可是在這一點上，今天的情況同蘇聯在過渡時期所處的情況也完全不同。當時蘇聯是唯一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相對立的國家。當歐洲一系列的國家，其中包括法國，遭受到法西斯的襲擊，英國擔心它的生存而在發抖的時候，只有蘇聯抵抗着希特勒的強大的戰爭力量，並且終於打垮了它。今天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同心協力地防止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今天這個陣營的領導力量，蘇聯的威力比起希特勒發動瘋狂進攻的時候，已經大大地增強了。和平陣營的各個國家，其中包括擁有六億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增加了蘇聯的力量。今天帝國主義者發出關於原子弹、氫彈或鉛彈的歇斯底里的叫囂時，就使我們記起戈培爾在戰爭最後階段關於所謂能夠取得最後勝利的神妙武器的叫囂。當然新式武器是可怕的、大量毀滅性的工具，只有罪犯才能拿它威吓別人。可是戰爭挑撥者不要忘記，美國的城市和英國的島嶼也同地球上任何別的一點一樣害怕這種武器！

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知道，戰爭的勝敗並不決定於任何神妙武器，而是決定於人，決定於人所生活的社會狀況。懂得解釋二十世紀的歷史的人都知道，歷史正不可遏止地向着社會主義勝利的方向發展，並不像那些蠢才從一

个世纪以来就假定的那样，是因为外国人和异乡人散布叛乱的思想，而是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本身所促成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任何战争都不能阻止这种过渡，它只能使它困难些，使它流血，付出牺牲的代价。因此我们的政策就是根据危险性的大小，动员我们的力量，保卫我们的成果，同时尽一切力量阻止战争发生，争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这样我们就能把力量集中到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和平工作上去。

从以上所说的苏联同其他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不同点可以得出结论，由于苏联人民所做的工作，其他国家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任务就比苏联当时容易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特点和阶段

除去对于在总危机的第二阶段进入过渡时期的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基本特点之外，各个国家还有它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对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具体措施发生影响。我们来研究一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些特点。

对于我们共和国的一切措施发生影响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德国被帝国主义者分成两部分，因而产生了对于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的一种严重威胁。由于这种分裂，为争取德国的民主统一而进行斗争就成为中心问题，一切其他问题都必须和这个问题相一致。

从合乎历史规律的观点看来，在整个德国很早就有一种迫切的必要，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之

間的矛盾。壟斷資本的桎梏不仅阻碍生产力的自由發展，而且也給整個德意志民族製造了致命的危險。壟斷資本兩次把德國人民投入毀滅性的、絕望的世界大戰之中并且在德國建立了法西斯主義。一九一八年，歷史就已經提出了使生產關係同生產力性質相一致的任務。因為當時這個任務沒有能够解決，所以德國就向着導致法西斯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深重的道路發展。同樣的問題在一九四五年更加迫切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戰勝國在波茨坦協定中達成的協議證明了這一點。戰勝國確定了“消滅目前卡特爾、辛迪加、托辣斯及其他壟斷組合所形成之經濟力量之過份集中”的目標。當時整個德國的廣大人民群眾也是為達到這個目標而努力的。只要舉出黑森的人民投票贊成把基本工業移交給人民這件事就可以證明。可是西方戰勝國家，特別是在波茨坦協定上庄重地簽過字的美國，實際上不願意清除德國的壟斷資本，而是想把它保留下來，為它自己的帝國主義目的服務。因此它在西德和南德破壞波茨坦決議的實施，藐視人民以民主的方式表达的願望，并且恢復了德國壟斷資本的權力。舉幾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件事：“被分散了的”冶金康采恩，一九四五年有九亿六千四百万馬克的股本，今天有二十七亿六千七百万馬克的股本。法本化學托辣斯在全德國曾經有十亿九千四百万馬克的股本和準備金。它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領域內喪失了一半的財產以後，今天繼承它的幾個最重要的公司又擁有十亿八千五百万馬克的股本和準備金。汽車工業中的兩個最大的托辣斯，國民汽車工廠和歐培爾工廠，一九五二年生產的小轎車占總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六點五，一九五四年就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五點七。三家大銀行（德意志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

考迈茨銀行)的結算額一九三八年达八十亿馬克，而繼承它們的事業的銀行在西德大大縮小了的地區上增加到一百三十亿馬克以上，它們的貸款从三十三亿馬克上升到五十八亿馬克。

因此產生了這樣的事實，只有在德國的一個部分，在今天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才能着手並且開始執行，解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同生產力性質之間的矛盾的這一歷史性的偉大任務。

可是這時也就出現了歷史的特點：德國法西斯的國家政權不是被德國工人階級的革命行動摧毀的，而是被戰無不勝的蘇聯軍隊摧毀的。德國工人階級和一切反法西斯主義者的抵抗的力量太弱，沒有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同時也要考慮到，與進行反法西斯抵抗鬥爭的人民民主國家相比，德國缺少民族解放的因素，而這種因素在被法西斯壓迫的國家曾經有力地推動了反法西斯鬥爭。蘇聯軍隊摧毀了德國帝國主義的政權，這個政權曾經利用雅里安優秀種族的有毒思想，殘酷地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的人民。

由於蘇聯軍隊解放了德國東部，德國民主力量就獲得了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它開始根據波茨坦協定建立新的民主的行政機構。當然，在新建設中，由曾經是反法西斯抵抗鬥爭的領導力量的工人階級擔任領導。

根據波茨坦協定，德國的這一部分在蘇聯占領軍隊友好的支持下，進行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剝奪了德國最反動的階級，東易北河的容克地主的權力。農民、農業工人和移民們得到了土地。按照波茨坦協定，通過沒收戰犯財產消滅了資本主義壟斷。他們的企業變成了人民的財產，由此生產關係同生產力性質之間的矛盾就開始

得到解决。在文化領域方面，上千年的有产者的教育壟斷被打破了，德国文化民主發展的道路打开了。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长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并不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的結果。它是在摧毁了帝国主义国家机器以后产生的。但是工人阶级能够通过实现本身的統一，加强领导作用，巩固与劳动农民的联盟，把所有民主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由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阶级給工农政权創造了人民民主的基础。由此就有了开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前提。在这一工作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阶级积累了领导社会和国民經濟的丰富經驗，这些經驗对于解决过渡时期的任务是不可缺少的。

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政权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了革命的变革，其結果就創造了适合人民共和国發展的新的經濟条件。

在这些革命的变革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战后第一个發展阶段居于首要地位：土地改革是反封建的革命，建立民主政权是反納粹、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在战后的第二个發展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反法西斯的民主机构成长为工农政权。可是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两个阶段严格地分开是錯誤的，因为它们是互相錯綜在一起的。因此在第一阶段就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由于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同生产力性質相适应的規律，在绝大部分的工業中建立了公有制，一九五〇年已占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一。随着生产資料公有制（人民所有制）的建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开始决

定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忘記，土地的国有化是不能作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个任务来完成的。

由于德国分裂这一事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其他人民共和国有一个較長的过渡时期，各种經濟形式并存的时期也要长些。因为在执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总的經濟政策时必須經常考慮到它对于整个民族的意义。瓦尔特·烏布利希在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二十一次全会上說过：

“我們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們必須从这一点出發，即我們的政策必須永远同为恢复一个民主德国的統一而斗争的战略战术相一致，由于我們祖國被分裂，在我們國內就产生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殊困难……”

过渡时期的特点是同时存在各种形式的生产資料所有制。除去工業、运输業、商業和農業中的強大的社会主义成分之外，还有許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經濟，这些人是简单的商品生产者。此外还有一批中等的资本主义企業。党的經濟政策是从这些經濟成分长期并存这一点出發的。”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也在于，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質，也就是说，要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获得胜利。可以預計，这一任务的解决将大大地促进在民主基础上恢复德国的統一，因为它使西德人民看到，他們怎样才能解决今天已經成为西德經濟的特征、将来一定还要更加尖銳化的矛盾。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德国被分裂这一事实，在德

① 瓦尔特·烏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柏林迪茨出版社1954年版，3至4頁。

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經濟措施的执行中，產生了許多重大的困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全部复杂性是由于过去十年德国两部分的不同發展产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始解决历史性的矛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在西德，具有一切反动和侵略特性的德国帝国主义又在違反波茨坦协定的情况下复活了。美国壟斷資本在这方面的帮助以及占領当局使得德国帝国主义依賴于美国帝国主义，这样，西德的劳动人民就遭受到双重剥削。壟斷資本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在西德發揮着把全部重担压在所有劳动阶層身上的作用。

一九五四年許多重要部門的工人，如五金工人、紡織工人、公用事業工人以及其他工人为反对他們的状况的不断惡化而进行了大規模的要求增加工資的斗争，这一事实最明显地証明了西德工人阶级的状况。虽然工人們通过这些斗争，工資得到了一些提高，但是他們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因为生活費用的增长早已超过了工資的提高。正如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的“工業快報”上所报道的一样，西德的一个消費研究所向三百七十二个工人詢問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以來增加工資的結果。問題是增加工資有沒有提高購買力。百分之四十三的人給了肯定的答案，百分之三十九的人給了否定的答案，百分之十八的人沒有發表意見。这就是說虽然經過斗争工資有所增加，但是一半以上的工人並沒有感到他們的状况有所改善。与此相反，也在一九五四年，西德工人遭受到更为厉害的剥削。一九五四年一月到十月，在西德工業中每一小时的成品比一九五三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三点二，在基本原料和生产資料工業中甚至增加

百分之七点六○。一九五四年，在西德已登記的失業人數達一百二十萬人。西德勞動人民的債務增加特別清楚地說明他們的貧困處境。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漢堡“世界報”報道，在過去九年中，五個顧客中有四個（也就是百分之八十）是分期付款的，十家有四家欠糧食商人的帳。

西德農民一九四八年負債二十四億馬克，一九五一年增加到六十五億馬克⁽¹⁾，這一事實最好地說明西德農民日益貧困。西德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小企業主的境遇也並不比農民好些。一個確實的標誌就是西德空頭支票和付款命令及執行命令的數目逐年迅速增加。一九五〇年每月平均有兩萬零六百六十四張支票，一千四百六十萬馬克的款項付不出錢，而一九五二年是兩萬九千二百四十四張支票，一千六百九十七萬馬克，一九五四年（一月至十月）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張支票，二千六百万馬克⁽²⁾。埃森、海米姆和奧拜豪森市區的區法院的付款命令和執行命令的數目達到⁽³⁾：

	付款命令	執行命令
1951年上半年	37,255	22,846
1952年上半年	42,371	29,650
1954年上半年	50,273	35,043

波恩經濟政策的特別悲慘的事件就是西德知識分子的貧困處境。只要舉幾個例子就可以說明整個情況。西德高等學校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教師（講師和助教）每月只拿到三百至五百馬克的薪金。許多高等學校的教師都被迫尋找

(1) “德國經濟研究所報告”，第一號，1955年1月，第十八頁。

(2) 1954年7月31日“新德意志報”。

(3) 威斯巴登聯邦統計局，“統計月報”，按月統計數字。

(4) 1954年8月5日“埃森日報”。

副業。最低月薪四百八十馬克的法學家們被“法蘭克福大眾日報”描繪為“法律的挨餓牧師”。情況特別惡劣的是西德的醫生。被雇用的二萬七千個醫生之中差不多有一萬七千人是充當助理醫生。其中有七千人是按照薪金表支薪的，八千人的薪金低於薪金表所規定的，兩千人的工作是沒有報酬的。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可以在醫院裏吃飯，拿到三十到五十馬克的零用錢。同樣，西德的自由創作的作家和藝術家的境遇也是非常悲慘的。一九五四年在下薩克森所作的一次調查說明大多數的作家、作曲家和造形美術家依靠他們的家屬的收入生活。慕尼黑的一千名自由創作的画家和雕刻家之中，只有不到五十人能够根據合同得到比較合乎常規的收入，其他的人都靠救濟金生活。這是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号弗拉堡的“巴登日報”報道的。

同西德各劳动階層的悲慘境遇相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劳动人民却一天比一天幸福。國營工廠中一個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資是：

1950	261 馬克
1951	295 馬克
1952	312 馬克
1953	339 馬克
1954 (上半年)	357 馬克

一九五四年平均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九點二。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農民的純收入增加了三點二倍。大家都知道，在我們共產國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怎樣得到了改善。在我們這兒沒有高等學校的教師、醫生、作家、藝術家等等為物質貧困所迫去尋找其他工作。這種情況使得我們能夠肯定地說，與西德旧的帝国主义制度相比，德意志民主共

和國———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已經開始在這裡發生作用——新制度的优越性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靠着外國的帮助，德國帝國主義在西德又復活了。今天已經十分明顯地表示出它保持着旧有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但是很明显，复活了的德国帝国主义比較旧日的德国帝国主义弱些，它也不可能恢复从前的力量。因为在它手里的已經不是整个德国，它受着它的最大的竞争者美国帝国主义的約束，它在前进的阶段上为同样的内部矛盾而苦恼，这些矛盾是旧日的德国帝国主义就沒有能够解决的。与此相反，在德国的另一部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制度。一种新的、进步的生产方式在这兒發展，对于西德的进步力量來說，它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吸引力。我們共和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成就的偉大的民族意义就在于此。

西德的統治者企圖使群众相信，新建立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削弱了的力量可以通过把西德与美国帝国主义結合起來而得到补偿。但是十分明显，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与美国帝国主义相結合就把西德經濟隶属于背負着危机和灾难的美国壟斷資本主义。对美利坚合众国來說，一九五四年显然是存在危机的一年。与一九五三年相比，鋼的产量降低了二千一百十万吨，小轎車的生产減縮了百分之十点二，卡車的生产減縮了百分之十五点三，工業生产指数降低了百分之六点七，这仅仅是举了几个数字③。人們并不需要什么預言的才能就可以断定，这种危机的現象对于西德是會發生影响的。如果危机尖銳起來的話，美國壟斷資本

③ 1955年3月2日莫斯科“真理报”。

将毫不犹豫地把危机的重担压到它的僕从国家身上，特别是西德身上。今天，头脑比較清醒的西德經濟界人士已經認識到美国的控制絞杀了西德的商業，并使它脫离了它在东方的最重要的銷售市場。他們也看到美國的所謂援助今天已經使西德負了一大笔債務，这笔債務將使西德人民好几輩子成为欠美國壟斷資本的債的奴隶。

相反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灾难性的循环，危机——战争——危机已被克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对外貿易蓬勃發展着，人民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負任何債務。

德国两个部分發展的这种根本差別扩大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一切措施，特別是經濟措施对于德国人民的民族斗争的意义。

除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过渡时期的这一最重要的特点，即德国的分裂之外，还必須举出另外一些由于德国的历史發展所产生的民族特点。

在过渡时期开始以前，德国早就是一个工業高度發展的国家。二十世紀初，德国已經在世界工業生产方面仅次于美國而居第二位。一九二五年德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点四，而农村人口只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德国的工業具有高度的技术，而且非常集中。高度發展的机器制造工業起着領導作用。根据一九二五年企業統計，工業部門从业人员中有百分之四十在基本原料和生产資料工業中工作，其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在建築業中工作。仅在机器、器械和交通工具制造工業中工作的人就占工业从业人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

由于这个特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过渡时期的具有特征性的任务就不像其他国家一样是工業化，是把農業国变

為工業國，它的任務却是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革。這個任務很重要的一部分已經通過在工業中建立人民所有制——國營工廠——而得到解決，它將繼續通過我們社會主義工業數量上的迅速增長和質量上的迅速提高而獲得解決。此外我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必須克服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由於德國的分裂而新產生的不合比例的情況。這個任務我們也已經開始解決了。由於新建和擴建了冶金工廠，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薄弱的冶金工業基地得到了顯著的發展。現在我國劳动人民正在努力克服煤炭、電力和某些化學工業部門發展不足的情況。

社會主義不可能沒有大机器工業，也就是說沒有重工業，特別是機器製造業。凡是沒有重工業的國家——過去的蘇聯，現在的大多數的人民共和國——必須在過渡時期建立重工業。由於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有了包括機器製造業在內的高度發展的重工業，因此我們在過渡時期的任務就大大減輕了。當然這兒必須有两点限制。我們的大中工業企業由於戰爭的影響，特別是由於美國和英國飛機的轟炸，破壞得非常厉害。一九四五年，我們几乎每樣東西都要從廢墟中挖出來。然而在一九五〇年我們就已經能够超過戰前工業生產水平了。這首先要感謝我國工人、技術員和工程師無畏的工作熱情以及我們蘇聯朋友的無私的援助。

此外由於德國的分裂而產生了一些嚴重的不合比例的現象。因為德國內部的貿易受到阻撓，所以我們必須通過發展一定的工業部門來克服這種現象。

打倒希特勒法西斯以後，我們的決定性的力量是工人階級。德國資本主義工業的高度發展也創造了為數甚多

的、掌握了高度專門知識的無產階級。几十年來，德國工人的勞動在全世界享有很好的聲譽。德國的工人階級也有過一段光榮的革命歷史。它最優秀的力量——一九四六年促成了兩個工人政黨的聯合——在反對法西斯獨裁的鬥爭中受到過鍛鍊。這樣一個工人階級的存在也使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過渡時期任務容易解決得多。對於其他一些國家有着非常重大意義的任務——擴大工人階級的隊伍——對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却沒有同等的意義。目前甚至有另外一件任務擺在我們前面，那就是為了克服農業上的落後狀態，把進步的工人轉到農業中去。

但是我們也不能低估了這樣一種情況，那就是德國工人階級比較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較為嚴重的、較長時間的受了改良主義、沙文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思想的影響。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廣大的工人階層的思想改造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過渡時期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工人階級中所發生的成分上的變化使得這個任務具有更大的意義。戰爭使得許多小資產階級分子無法生活，一九四五年以後法西斯國家的很多職員失去了維持生活的基礎，這些人在工業企業中找到了歸宿，然而他們的思想一點也沒有改變。發揚新的社會主義的意識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重要任務之一，它只有在頑強地反對現存的資本主義觀點的鬥爭中才能實現。

現在我們再談談德國的另一個特點。雖然德國的農業也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遠遠地落後於工業，可是比起其他国家來，它還是具有較高的發展水平的。在德國使用機器、電力和化學肥料還是相當普遍的。因此在德國每公

頃的产量也比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大国高得多。譬如一九二七年每公頃的产量(以一百公斤为单位)达到：

	小麦	黑麦
德国	18.8	14.5
法国	14.2	11.5
意大利	10.8	12.1
美国	10.0	10.0

战前在德国就已经特别发达的是畜牧业，它的产量差不多占农业生产的三分之二。畜牧业的产量也比其他资本主义大国高些。

德国的农業经历过一段漫长的苦痛的“普魯士的”發展道路。这条道路，正如列寧^①所指出的，“它的特点是，中古时代的土地占有关系没有一下子被消灭掉，而是慢慢地和资本主义相适应，所以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半封建的状况附着于资本主义。”^②这条“普魯士道路”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保存了普魯士的容克世家，他們是农業人口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直到最近一个时期都保持着半封建的統治权。一九四五年土地改革才把这些封建主义的殘余扫清了。

德国农民之中，阶级差别是很大的。一九三九年占全体农戶百分之零点五的三万四千个地主占有所有土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五百多万貧农的土地还占不到百分之十。虽然貧农只有經受巨大的貧困，通过最大的努力才能保住他们的产业，虽然他們往往只有經常在工业部門工作才能获得他們微少的生活費用，可是他們仍然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这些土地常常已經傳了好几輩子了。对中农說来，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117頁。

情况就更为严重。恩格斯所說的“頑固的私有觀念”在德国农民身上特別得到發展。当然这就給过渡时期的巨大任务，农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增加了困难。

一九四五年进行的民主的土地改革并沒有把土地收为国有。在这次土改中仅仅沒收了战犯、納粹头子的土地以及一百公頃以上的私人占有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变为国家的土地基金。在这些土地的一小部分土地上建設起国營农場，从而在农業中产生了公有成分。绝大部分土地都分給了無地少地的农民、雇农和移民，算作他們的私有財產。由此貧农和中农的数目大大增加，在农村中为民主創造了牢固的基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获得了一个新的基础并且大大巩固了。在把土地分給移民时，使得过去的富农也得到了土地，因而变成了貧农和中农，当然，他們的思想却沒有發生相应的变化。

德国工业的高度發展以及农業發展水平較高使得过渡时期通过合作化，领导农業小生产者走上社会主义發展道路的任务容易完成。工业和农業之間的商業結合能够得到迅速發展，并且較快地通过生产結合得到补充。另一方面由于德国世代务农的农民的頑固的私有觀念就使得这一任务的解决發生了严重的困难。

与德国經濟的整个發展过程相适应，在它的所有部門，包括农業在內，商品关系非常發達，因而商業和运输業具有很大的意义。一九二五年商業和运输業的从業人員就已达一千零五十万人以上。

对外貿易的結構給我們指出德国經濟的另一特点。八十多年以来，德国就日益需要从国外輸入粮食、飼料和工業原料，这种輸入是可以用工业成品的不断增长的输出相

抵的。一九二八年進口的糧食、飲料、原料和半成品，占全部進口物資的百分之八十一點五，而出口的制成品占全部出口物資的百分之七十二點二。雖然由於農業的迅速發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對糧食進口的需要已經有所減低，可是上述的比例大體上仍然適合於我國的情況。由於同蘇聯以及整個世界民主市場建立了緊密的關係，我們共產國既能輸入需要的商品，也能銷售我們的產品。

當我們考慮到所有這些特點，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到目前的發展作一次全盤考察時，我們可以把它基本上分為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互相錯綜在一起，所以我們不能形式地把它們分開。

第一個階段是到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為止。在這一階段主要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實行了土地改革和其他的變革，反法西斯的民主秩序的國家機構成長為工農政權的國家機構。隨著帝國主義的消滅，在工業、運輸業、銀行業、保險業、農業和商業中形成了國營成分。隨著最重要的大企業投入生產，開始了國民經濟的計劃化。這樣就出現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並且開始發生作用。

第二階段是从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開始的。由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成立，工農政權在人民民主的基礎上鞏固起來。兩年計劃（一九四九——一九五〇）的完成加強了國營經濟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優勢，同時它也使我們能夠向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計劃過渡，使我們能夠制訂和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五年計劃方面的成就使得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生產結合的加強以及使農業走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為可能。其次，工業和農業發展上的成就使得對勞動人民的物質供給能够

向前迈了重要的一步(实行新方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在第二阶段里显著地扩大了，并且成为影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概况 和经济规律的作用

由于工农政权的组成和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条件，由于国营经济的形成和扩展，有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条件。任务在于，在过渡时期中清除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时候上层建筑，工农国家，工人阶级的政党，新的意识起着一种非常积极的作用。工农国家是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决定作用的工具。工人阶级是这一建设中的领导力量。

社会主义基础胜利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的建立。这种物质生产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社会性的生产和社会性的占有。可是今天社会性的生产只有在社会性的生产资料，即所有经济部门的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所有国家在过渡时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些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把细小、分散的农业引上大工业的、集体的农业生产的轨道，同时消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劳动人民的贫困化，经常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状况。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三个基本任务也摆在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面前。

我已經說過，在德國解決第一個問題是有有利條件的。重工業和機器製造業不必新建，相當數量的技術骨幹已經具備。第一個任務在於賦予這些工業以社會主義性質。這是通過把它們轉變為社會主義財產開始的。通過建立新的並且擴大現有的社會主義企業，通過不斷地改進國營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領導方法，通過經常適當地利用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社會主義的大工業繼續發展着。第二個任務在於克服目前不合比例的現象。這一工作是從大力發展我們的冶金工業開始的，現在還將通過加速發展煤炭、電力以及化學工業中的某些部門而繼續這一工作。

拖拉機和農業機器製造工業的高度發展也給農業方面的社會主義大生產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這一方面現在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在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的情況下，克服農業普遍落後于工業的現象。這就需要利用個體農民經濟中的巨大潛力。

在改善勞動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狀況方面，特別是最近幾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獲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掌握和正確適用為在這一方面繼續前进創造了前提。

新的社會生產關係特別推動着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這是社會主義勝利不可缺少的條件。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中出現的生產關係和現代生產力性質的一致為發展社會主義物質生產基礎創造了決定性的條件。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是發展生產力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生產關係帶有過渡時期的性質。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它的特點就是具有三種形式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因而也就具有三種經濟形式。現在在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有：

甲、社会主义所有制，分为两种形式：

1. 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国家所有制和公有制，以工业、农業、运输業、商業、銀行業和保險業中的国营成分为代表；

2. 集体所有制，以消费合作社、农業生产合作社、农民商業合作社以及其他农民合作社（乳酪業合作社等）、漁業合作社以及手工业合作社为代表。

这两种所有制形式构成社会主义經濟成分。它在工业方面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在农業方面約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铁路、银行、保險、对外貿易全部属于社会主义經濟成分。

可是还必須注意到，这些合作社本身仍然部分地具有过渡性質：譬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农業生产合作社就不能同苏联的集体农庄同等看待，因为前者所耕种的土地仍然是属于社員私人所有的。因此一部分收入不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的規律而是根据入社的土地股份，作为絕對地租的一种形式来分配的。虽然如此，农業生产合作社無疑地属于社会主义經濟成分。在我們共和国还有純粹資本主义的合作社，关于这一点我們以后再談。

乙、其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資料私人所有制，它存在于下列三个方面：

1. 貧农和中农的私有經濟；
2. 手工业者經濟；
3. 私营零售商的小企業，这些人沒有生产資料，但有私人的流通資料，靠自己的劳动生活。

这三部分构成小商品經濟。它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具有很大的規模。在农業方面，小商品生产占总生产量的

一半以上。手工業大約有二十五万个企業（有八十万個從業人員），一九五四年總銷售額達到六十五億馬克以上。在零售商業方面，一九五四年有十七萬個私營商店。手工業和零售商店的規模從實行新方針以後擴大了。私營零售商從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四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在同一時期，手工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丙、最後還有資本主義所有制，存在於六個方面：

1. 資本主義工業企業；
2. 資本主義性質的大型手工業企業；
3. 富農經濟；
4. 批發及零售商業中的資本主義企業；
5. 資本主義的運輸企業（航運和動力運輸）；
6. 資本主義的合作社。

這六部分構成資本主義成分。它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相當大的。一九五四年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在共和國的生產總量中占百分之十五。在這一年它的生產量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富農經濟還義務交付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商品生產。在批發商中還有八千多家私營企業。

第六點中提到的資本主義合作社所有制需要有一點解釋。大家都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的合作社，甚至於工人消費合作社都是受資本主義規律所支配的。在工农政權的條件下，許多合作社改變了它們的性質，譬如消費合作社、轉變為農民商業合作社的農業購銷與信貸合作社（以前的糧食及農貨協會）、乳酪業合作社等等。它們在新的條件下變為社會主義的合作社。但是並非所有的資本主義合作社都是如此，也有的合作社仍然保存著資本主義性質。舉凡

个例子：

今天在西德还有一九〇七年成立的“已發記的社團，德国商人合作社艾德卡（即德国食品商收購合作社）联合会，一九三八年，这个自己拥有一个銀行的联合会的批發銷售額達到一亿馬克。即使在今天，这个資本主义的大聯合會在我們的共產國還有一百二十六個做批發生意的地方性的收購合作社。

在德累斯頓有一个鷹記釀酒合作社，共有二百个工人。

馬克特堡行政区的克洛采制酒合作社大約也有二百个工人。

萊格勃魯赫制刀合作社約有三十个社員，二百个职工。

哈尔登斯来本县多倫浸廠工場，也是一个合作組織，約有二百个工人，每年貿易額為二百万馬克。

斯登达尔地方的老美而克罐头工厂合作社約有六十五个职工，每年貿易額為一百萬馬克。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繼續舉下去，因为除了那些較大的資本主义合作社之外还有很多較小的合作社，举例說，有一千八百个手工業購銷合作社，大概有一千个各种農業及林業合作社（既不是農業生产合作社，又不是农民商業合作社），二百个住宅及建築業合作社以及很多其他的合作社。如果我們把所有這些合作社都划为社会主义成份的話，那我們就要犯一个原則性的实际上的大錯誤。它們之中的極大部份只能是屬於資本主义成份，因此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中也應該根据這樣的原则來对待它們。很多較小的合作社，特別是农林業以及手工業方面的，則有可能發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除了这三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資料所有制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有一种范围極广的租赁房屋私有制，通过房屋租金，这种私有制每年在国民收入中摊到八亿馬克。

最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着劳动人民的个人必需品的个人所有制，包括受到法律保护的住宅在内。这种所有制將隨着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日益扩大的作用不断地增加。今天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有很多的劳动人民，获得了比以前一生加起来还要多的私人財产。这也实际地証明了社会主义不仅把人們从剥削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劳动人民在个人需要的一切物品上比他們在以前的社会制度下所得到的要丰富得多。

私人所有制的一个特殊形式就是合作社农民对他个人庭園經濟的占有，这种占有的范围是由农業生产合作社的社章加以規定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产資料所有制的三种基本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标志，适应它們的就有目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一种經濟形式。在我們的著作中有时談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有一种社会經濟形态，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简单的商品經濟并不是一种社会經濟形态。

这三种經濟形式表現出历史發展上的三个不同的阶段。

建立在生产資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成份是發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成份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社會性之間的矛盾已經消除。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成份完全掌握了經濟命脉：大工业、銀行、铁路、机器拖拉机站和对外貿易。因此社会主

义成份影响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全部国民经济。

建立在生产资料个体劳动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经济成份，在我們这儿是发展的最低阶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成份中还没有展开，因为生产资料主要带有个体性质，微小而不起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个成份有着“不断地、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趋势，但是由于工农政权及社会主义成份的存在，也有可能使这些小商品生产者摆脱这条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接引他們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在这里，工农政权对于劳动农民的巨大帮助起了主要的作用，特别是通过机器拖拉机站使他們能掌握新的现代化的技术以及运用科学的方法。这样在农业上也展开了现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新的性质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没有冲突而是通过个体农民自愿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来解决的。同样手工业者也有可能通过组织合作社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

资本主义成份是介于其他两个成份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成份里，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不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第一，这个成份相对來說还是很小，第二，沒有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存在，第三，资本主义成份不掌握经济命脉，第四，社会主义成份和国家经济计划影响着资本主义成份。但是也不能忽视，资本主义成份的存在以及它内部的矛盾构成危害整个国民经济的因素。

各种经济形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过渡时期中同时存在，使得解决经济問題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研究这些成份之間錯綜的关系和研究各种成份共存的条件下經

濟規律的作用，就成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經濟科學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我們不應當只是孤立地看到社會主義成份以及研究這個成份中蘇聯科學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而是應該根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過渡時期和德國分裂的特殊條件具體研究經濟問題。

列寧曾經指出，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階級將存在許多年。但是階級並不是舊目的階級，而是在過渡時期改變它的性質，逐漸變成新的階級，變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我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看到這一點。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人階級已經不是古典意義上的舊的無產階級了。他們既非無產，又不再受壓迫，而且絕大部份也已經不再受剝削了。工人階級已經成為社會的領導力量，成了統治階級。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中也有他們的一份。隨著他們社會經濟狀況的改變他們的意識也改變了。他們對社會主義財產及對勞動的態度已經不同。勞動由負擔及痛苦變成了一件光榮的事情。生產中的勞動競賽和工人自己提出的個人義務證明了這一點。

勞動農民階級已從財政資本及容克地主剝削中解放出來。他們對土地的渴望，得到了滿足。他們從容克地主及資產階級的附屬物變成了工人階級可靠的同盟軍。一部份最進步的勞動農民已經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新的農民階級。馬列主義規定勞動農民階級是：

“農民是個小生產者階級，其中組成分子，好像一盤散沙，散佈在全國地面上，各人單獨在自己的小農莊上運用落後技術來勉強從事耕種，他們是私有制度的奴隸，是被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等等放肆剝削的……”^①

如果認為，這個階級定義對我們的合作社農民還適合

的話，那是可笑的。他們不是分散經營而是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內。他們不是在小經濟中辛苦勞動，而是在經營着巨大的農業企業。他們不因使用落后的技術而受苦，而由于工农政权的支持，他們已可以利用最現代化的技術并使用最新的科學方法。他們不再是私有財產的奴隶，而是把大部份的生產資料變成了合作社所有，再也不会遭受地主和富農的剝削了。所有這些都說明，合作社農民從嚴格的科學意義上講已經不屬於劳动農民階級，而是成為一種新的階級形式的萌芽。全體劳动農民在過渡時期內都將變成這樣的一個新階級。因此特別重要的是，合作社農民要同个体劳动農民保持最緊密的聯繫，并且給予他們各種幫助。

工人階級、劳动農民階級和合作社農民一起構成過渡時期的主要階級。

知識份子在過渡時期同樣也改變它的性質。他們的進步份子靠近工人階級并緊緊地跟着它走。在過渡時期，從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發展了一批新型的知識份子，他們牢靠地在這兩個主要階級中扎了根。

資產階級作為剝削階級在過渡時期還會存在一個長時期。它包括工業、商業、運輸業中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本家以及富農。但是即使是最後一批資本家也改變了它們的性質。財政寡頭的統治已被推翻，舊資本家和容克地主一樣已經不知去向。剩下來的是中小資本家，只要資本主義成份繼續存在，他們就能在国民经济普遍高涨中得到發展。

由于過渡時期中各種經濟形式的存在，就有必要充分利用商品生產、商品流通以及它們的規律。但是必須強調：

◎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 675 頁。

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商品生产还不是只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发生关系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特殊形式的商品生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商品生产不仅要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国营企业，合作社发生关系，还要和简单商品生产者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发生关系。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商品生产已不再是原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因为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并且工农国家支配着主要的商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商品生产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既包括新的又包括旧的商品生产。

利用商品生产建設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間正确的联系，从而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联盟。同时通过商品流通可以在国民经济的所有成份之間建立必要的关系。适应这些任务的政策就是新經濟政策，它利用市場、商業及貨幣流通來达到这个目的。新經濟政策的重点在于發展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經濟联盟。上面已經講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有利的条件，城乡之間的商業結合可以迅速地通過生產結合來补充，这就大大地減輕了克服農業落後于工業的任务。

除了社会主义工业外，社会主义成份在农業中也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由国营农場、机器拖拉机站以及农業生产合作社組成的社会主义成份，最近几年來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基礎的农業技术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沒有把地方性的农業企業計算在內，因为這是暫時的現象）

国营农場在一九五〇到一九五四年把农業耕种面積从一九四〇九二四公頃擴大到二七八、二一公頃。它們最重要的机器装备在同一时期的增長情況：

	1950	1954 (计划)
30匹马力拖拉机	1,196	4,758
拖拉犁	1,674	3,408
牵引联合收割机	1,009	1,463
收割机	—	171

牲畜数量在这同一时期内也有了增加。最重要的几种牲畜：

	1950	1954(计划)
牛	54,700	108,000
其中母牛	17,120	50,000
猪	91,916	660,000
羊	129,388	237,000

国营农場每公頃農業耕種面積的收入由一九五〇年的二、一九馬克增加到一九五三年的一、五八一馬克。

机器拖拉机站的增长也非常迅速，一九五〇年有五十五个，而一九五四年则增至六十五个。最主要机器装备增加情况如下：

	1950	1954(计划)
30匹马力拖拉机	11,638	33,450
拖拉犁	10,554	27,700
牵引联合收割机	4,617	14,100
收割机	—	1,013

在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农学家由一九五〇年的五十一人增加到一九五四年的一、六〇五人。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九五〇年刚开始建立的。当时只有三、八十五个，社員一、二三二人，土地一六〇、九七一公頃。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就已經有了五、一七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拥有一五八、三五六公頃社員及八七一、八一六公頃的耕地。其中大部份——拥有七一四、八八三

公頃的一三、〇六〇個合作社是最高級即第一種類型的合作社。

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僅在農作物方面比共和國的平均產量要高，而且它們牲畜的數量和質量也有了顯著的提高。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牲畜數量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

母牛	增加了	28%
猪	增加了	23%
白	增加了	62%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到一九五四年底在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中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在這一時期中約百分之八十五的社員是從前的雇農或移民，不到百分之十是世代務農的農民。

這個事實說明，世代務農的農民對於合作社的成見只能慢慢地克服，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即使願意接受機器拖拉機站的幫助，還願意進行个体生產。因此我們在農村的經濟政策必須比以前更多地幫助个体農民的經濟發展，通過商業結合的展開，就是說提供更多工業品來激勵他們增加商品生產，並通過開展生產結合給予他們幫助。同時繼續加強農業中的社會主義成份，特別要在經濟上組織上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便它們成為社會主義的典范經濟，通過它們的實際例子來說服个体農民，使他們認識到農業大生產的優點。目前對於農業一種特殊形式的帮助就是把政治上和業務上老練的產業工人派到農村中央。這一點具體的表現出工人階級對農民的帮助。

在為發展我們的農業而充分運用新經濟政策的原則時，必需克服輕視和忽視農民市場的情況。在一九五四年開辟的約一一千〇〇〇個農民市場上所銷售的商品額在國

民經濟中只占極微小的地位。如果能很好地進行準備和組織的話，這些農民市場能夠成為一個極有效的經濟杠杆，利用價值規律大大地提高農業生產。

作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經濟政策的新經濟政策，是一條階級鬥爭的政策。它預計到在這個階級鬥爭中首先要利用經濟力量、經濟命脈和正在發展的社會主義客觀經濟規律。但是必須再一次注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国家來有一些特點，這些特點是由於德國分裂而產生的，它表現在下列各點：

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受到西德和西柏林的有計劃的破壞。壟斷資產階級只是在德國的一部份——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失去了勢力，而在西德他們還充分地行使著權力。在共和國被沒收了財產的容克地主和壟斷資本家逃到了西德，並夢想再奪回他們的土地和工廠。所有這些份子在帝國主義占領國家的幫助下對我們共和國的和平建設組織阻撓和破壞，到現在還從未停止過犯罪行為。

二、對我們共和國的發展不滿的或者曾反對我們經濟制度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資產階級分子，組織了他們的“共和國逃亡”團體逃往西德。另外，西德和西柏林的机关（部份是在美國直接的指使下）引誘專門人材及知識份子到西德去。這方面他們也使用犯罪的方法。

三、但另一方面，在恢復德國統一的鬥爭中，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和平建設中，也出現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中的進步分子緊密合作的情況。因此資產階級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就不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力量，而是已經分化了。一部份反對我們的建設，並和帝國主義戰爭販子狼狽為奸，

而另一部份則在民族斗争中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民主力量進行合作。為了吸引其企業對國民經濟起作用的資產階級進步分子參加我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工農國家已經決定參加這些企業。

四、由於國營經濟同私人商品生產者之間關係的發展，就產生了一種新的關係。私人生產者在經濟普遍高漲下也獲得了利益。在爭取和平及德國民主統一的斗争中他們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工人階級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一些最進步的、目光最遠大的私人生產者改變了他們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态度。他們忠實于政府並積極地工作。這樣就有可能將忠實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那部份進步的富農也吸收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來作社員。這一點是瓦爾特·烏布利希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萊比錫舉行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及積極份子第三屆會議上提出的。也許看來這樣一種提法在原則上是不許可的，因為我們學過，資本主義不會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但是這種意見是幼稚的，機械的。因為首先我們應該考慮到，富農這個經濟定義附加的條件。把二七公頃作為一條機械的界限只是一個不足以說明一種農村經濟的真正經濟性質的外部根據。這裡我們舉瓦爾特·烏布利希在萊比錫所引的一個例子：在克呂采縣的魏頓村有個女富農蓋爾達·斯托梅斯特申請加入農業合作社，因為她和她年老的父親已沒有力量來耕種他們的一五〇摩爾根，即大約三十七公頃的土地並且已經把其中一部份的土地租給了別人。這個女富農擁有將近四十公頃的土地，但沒有使用別人的勞動力。這種經濟同二七公頃以下的、但剝削很多勞動力的經濟相比，資本主義的性質應該說是更少一些的。這一點不是很明顯的嗎？

其次再看一看恩格斯是怎样提出富农問題的，对于我们也会有好处。恩格斯在他的著作“法德农民問題”一书中提到富农和中农时写道：

“假如这些农民懂得他們現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趋于灭亡并且由此作出必要的結論，就讓他們到我們这里来吧，那时我們就将尽力帮助使他們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³⁾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在談到富农时，明确地訓獎了恩格斯的这段話。

当然，我們也不能忽視，苏联在过渡时期曾經指出，富农分子是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同时也指出，要使广大农民群众走向集体化就必须和富农分子展开不調和的阶级斗争的事实。但是，这也絕不是說，通过接受整个富农阶级参加农業生产合作社，給他們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接受忠實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富农。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須对每一个富农进行严格的审查。在这方面，也可以把某些，我是說很个别的几个，直到目前还頑固地坚持着二〇公頃以上的土地的分子排除出去。在來比錫的蓋格洛夫还有另一个名叫希登努尔的富农，就沒有被接受加入农業生产合作社，因为他占有八二公頃的土地，但是他自一九四六年就是德国統一社会党党员了！

就是在这个問題上我們也必須向苏联學習，我們的原则性的路綫不要形式地，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貫徹。虽然在苏联曾經不得不和富农阶级进行了極尖銳的阶级斗争，但在苏联也准許作为一种例外接受富农参加合作社。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438頁。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四日的一个決議中規定：

“在严格遵守不接受富农分子和其他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个人参加集体农庄的規定下，对于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紅色游击队員，紅軍和紅色艦隊的成員(士兵和军官)，农村学校男女教員的家属可以作为例外情况处理，只要这些人能担保他們的家属。”

由此可见，就是这个問題，在堅持原則性路綫的情况下，也必須要考慮到具体条件才能得到解决。

当然，隨着接受占有較多土地的富农參加農業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就会产生新的問題，特別是关于土地分紅的問題必須重新規定。

总之，可以說，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階級斗争在过渡期也必然是更加尖銳，并且由于德国的分裂而具有了特殊的形式，这就使得对群众進行革命警惕性的教育成了特別迫切的任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到目前發展的最重要的經濟結果是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在数量和質量上都比其他的方式优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經創造了新的經濟条件，在它的基础上產生了新的經濟規律，即社会主义經濟規律，并且开始發生作用。資本主义規律的作用由于新的規律产生而愈来愈受到了限制。不同的規律的冲突是过渡时期階級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現形式。

壟斷资本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經完全失去了它的作用，代替它的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它在国民经济的最重要部分中，在社会主义成份中決定了生产的目的。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众不斷增長的物

質和文化的需求是生產的動力。滿足的程度經常決定于生產的範圍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生產力的發展是为了尽量充分地滿足需要。

在簡單商品經濟成分中，價值規律還起着調節生產的作用，在確定價格時它是被有意識地利用的。但是，價值規律的作用在這個經濟成分中也已經由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影響而受到了限制。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資本主義成分中同樣也還是價值規律調節着生產。由於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已經完全喪失了作用，剩餘價值規律就代替它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然而，就是剩餘價值規律的作用，如已經指出的，也由於新的經濟條件而大大地受到了限制。

在西德，壟斷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在充分地起着作用，並且，就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樣，人民群眾的狀況不斷地惡化，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已經成了占統治地位的規律，它不僅在社會主義成分中起作用，並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有影響。從而迅速地改善了勞動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狀況。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形成以及發生作用對於爭取德國統一的民族鬥爭有著很大的意義，因為這樣就給全體德國人民指出了走向幸福將來的道路。

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形成了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並且逐漸開始發生作用。瓦爾特·烏布利希在統一社會黨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敘述了如何在這個規律的基礎上，逐漸有計劃地領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計劃是以把最重要的大企業，電力、运输、以及其他一些工業投入生產而開始的。隨後對各個工業訂出供給物資的計劃，直到最後經過自下而上的建設，經過各種經濟部門的經驗總結，就有可能得出真奐數字來，這些數字表現在各個季度以及一九四八年的下半年的半年計劃里。這是國民經濟整個計劃的開始。”①

大家都知道，在這第一個半年計劃之後，接著是兩年計劃，再後就是我們到一九五五年結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隨着我國國民經濟計劃的高度發展，我們愈來愈多地學習利用這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以及適應這個規律的需要確定了國民經濟中的必要的比例。但這我們還沒有有效地充分運用這個規律並把現有的不合比例的情況消除掉。從這裡可以了解，必要的比例並不是簡單地經過正確地制訂計劃，而是經過國民經濟的實際發展而獲得的。

在利用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對外貿易也特別重要。我國的經濟科學應該比現在更多地研究對外貿易在擴大再生產中的作用與對外貿易在適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下的發展。我們的機器製造業、精密光學儀器、化學工業所具有的巨大生產能力，使得為這些工業部門保證國外銷售市場成為必要，而另一方面我們也依賴工業原料和糧食的輸入。對外貿易的計劃同樣是我國國民經濟計劃、生產計劃以及財務計劃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它的實施在極大程度上決定於全部國民經濟計劃保持必要的比例。我國政府已經採取重大措施來改善對外貿易。例如由重工業與機器製造業派遣了二百名優秀的工程

① “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記錄”，第一卷，第343頁。

到國外市場去研究具體的條件。經濟科學在這方面也不應該落後，它必須對世界市場作科學的經濟方面的研究，必須制訂出科學方法來改善對外貿易的工作，並由此來幫助改善對外貿易。特別是要科學地制訂出在對外貿易中的經濟核算方法。這樣，在這個領域上也就能够為贏得利潤而進行有力的鬥爭。進行這一工作的出發點是，工農國家已經掌握了對外貿易壟斷權，並且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部分是針對世界民主市場。這一事實使得在對外貿易中利用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比較容易。

另一方面，在運用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時，必須制訂出生產計劃，以減少輸入糧食的必要性。

國民經濟計劃是適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要求的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具體運用。經濟計劃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因而社會的指導生產也是非常重要的。使經濟活動有效地進行的第一個前提就是正確的計劃，經常與經濟政策任務相適應的，並且是以運用經濟規律為基礎的計劃。計劃本身有錯誤或者是以不符合實際的前提為根據的，那麼在經濟生活中必然會發生難以抗拒的紛亂，這時就需要在年度過程中改變計劃，這在過去給我們的企業製造過不少麻煩。制訂計劃是一種極為複雜的科學工作，而且要負重大的責任。的確我們在制訂我們的計劃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且這項工作是在逐年地改善着。隨着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結束以及準備第二個五年計劃，我們已經達到了這一點，即我們必須在改進我國的國民經濟計劃上前進一大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政府簡化計劃的決議就指出了這一點。這個問題的幾個主要點是我現在要研究的。

政府決議的重點是提高各大企業的經濟活動的獨立性。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央的計劃就集中在各種最重要的國民經濟任務上，並且為了這個目的，還大大縮減了中央計劃的項目。各種大企業通過季度計劃的執行，就有可能把計劃工作更好地和生產的要求和居民的消費相配合。向制訂季度計劃過渡並不意味着削弱五年計劃或年度計劃。它的目的在于通過具体制訂季度計劃和月計劃來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年度計劃。

由於把國家計劃限制在最重要的國民經濟任務上，因此同時也有必要改進中央計劃的方法。這裡有幾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總產量的按值計算的計劃是以不變標準價格來實現的。總產量計劃的實現也是以不變標準價格來計算的，並且還作為獲得獎賞的根據。關於這個不變標準價格已經討論了多年，大家一致認為現在通用的不變標準價格早已過時，並且成為發展生產的一種障礙。在我面前有着無數荒謬的不變標準價格的例子，現在只需舉出一個顯著的例子。國營赫特斯德的銅製造廠厂長班德爾報告說：

“例如我們保持每公斤銅棒的價格為四點二五馬克，現在把它輾壓為銅線，就變成每公斤一點四八馬克，大約減少到三分之一；我們把這銅線再壓成二百分之一公厘細的銅絲，標準價格仍然保持不變；但是當我們把這些銅絲扭成銅繩，它的價格就跌到每公斤一點二六馬克。銅繩愈難做就愈複雜，不變標準價格愈低。我們製造出一種十分複雜的繩，每公斤只得到零點八八馬克，仅为銅棒不變標準價格的五分之一。”

这种情况不仅是这一个企業，許多其他的企業也是如此，經常是标准价格由于附加的劳动消耗而降低了。此外，現有的不变标准价格的差別太小，以致品种的简单改变对完成总生产計劃有極大的影响。显然，現有的不变标准价格不能再当作我們計劃的可用工具了。国家計劃委員會的負責干部，以及我們的经济学家早就應該討論這個問題，并且把它弄清楚。即使現在打算将按值計算的計劃的生产数量，作为实际納稅价格的商品生产訂出來，我們沒有不变标准价格或者任何其他不变价格仍然很困难，特别是在制訂第二个五年計劃时不能这样。在決定這個問題方面我知逍是有困难的，因为大多数的实价，特别是生产資料的实价和劳动消耗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就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找到理想的解決办法。但是对任何一种解決办法我們都必須迅速地作出决定，因为現在所通用的不变标准价格根本不能再繼續用了！

中央的計劃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防止或者克服以后在国民經濟發展中的机率的不合比例現象。我們現在還有許多并非必要的，必須迅速除掉的不合比例現象。我們可以拿合乎規格的工業生产的發展來說，例如螺絲釘和螺絲母。一九五四年对螺絲釘和螺絲母的总需要量为四万三千六百噸，可是我們只生产了二万一千六百噸，因此不得不有相当数量的輸入，虽然如此，仍然还有人喊着要螺絲釘。这种不合比例的現象只須采取少數的措施就可以相當迅速地消除的，用几架自动压制机，使用相当数量的材料，就能够滿足对螺絲釘和螺絲母的需要了。

这种不合比例的現象必須通過中央的計劃單位來迅速消除，因为由于不合比例而使国民經濟所遭到的損害，通常

在一年中力求消除这种不合比例的情况所需的投資要大。

計劃的生产任务和財政任务之間的关系是直到現在还没有完滿解决的一个問題。实际上有一种意見傳布很广，即認為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計劃，它們應該是相互一致的，但却时常不能一致。这并不是少見的，一个企業的生产計劃改变了，但是它的財務計劃則依旧未改。例如国营罗西茨焦油加工工厂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通过基本化学商会減少了四百万馬克的生产量，但是它的財務計劃却沒有改变^④。当然，一个企業不能有两种不同的計劃。企業的財務任务只能由它的生产計劃产生出来。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教科書”中写道：

“每个国营企業(工厂、矿井、国营农場、机器拖拉机站等等)都有自己的技术生产財務計劃，这种計劃根据国家的計劃任务編制出来，是企業的生产技术和財务工作的綜合計劃。”^⑤

这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企業都是适用的。但是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濟中，在現有的生产計劃和財務計劃之間仍然存在着不協調的現象。第一，这种不協調現象基于制訂这两种計劃的方法及其內容的差异上。生产計劃是按标准价格的总产量的計劃。但这个价值总数不能認為与財務計劃中所包含的指數有关，因为这种指數是在考慮到未結束的生产变动的情况下，以納稅价格来表示的商品生产价值。而这种价值量的确定只是商業部門或財務計劃上的事情。其次，直到現在專業計劃方面只

④ “德国财政經濟”，1955年，第5号，第177頁。

⑤ “政治经济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9頁。(重点是我加的……弗·厄斯納)

是計劃了技術上的統一，例如冶金產品就不顧其他的产品。但是財務計劃却包括了全部商品生產。只是到了現在，各專業計劃方面在它的生產計劃中才包括了全部商品生產。第二，這種不協調現象甚于批准這兩種計劃的時間上的差異。財務計劃通常比生產計劃批准晚得多。第三，這種不協調現象之所以發生，是由于生產計劃變動極大，而財務計劃却是較固定的。這就迫切需要改進我們的計劃，迅速克服生產計劃和財務計劃之間的不協調現象，在一個企業里有統一的“技生財計劃”（技術、生產、財務計劃），把技術發展的需要、生產程序和財務活動都總括到一個計劃內。“德國財政經濟”杂志在上一期的社論里對這個問題作了研究，但是對這個事情的論述是有些片面的，即“計劃工作者對通過市場來檢查生產的重要性給予的評價還太低。”^①這当然是正確的，但是同樣正確的是，當企業要求批准財務計劃或指出計劃不能執行時，財政机关經常就犯重罪了。應該像社論所提出的完全正確的要求一樣，由兩方面來安排這件事情。

由於簡化計劃的決議，各个主要機構，特別是企業都得到了較大的獨立性，因而對它們的計劃也負了較大的責任。因為他們要對自己產品的銷售負責，所以他們將來不仅要和商業部門更好地合作，而且要比現在更好地應用合作制度。在消費品工業里，與消費者訂立合同應該成為制訂生產計劃的基礎。如果做到了這一點，那麼許多中途改變計劃的情況就不再會有了。而到現在我們的情況正好與此相反：上級下令改變計劃，常常要求已經訂立的合同也改變。對於

① “德國財政經濟”1955年第5期，177頁。

這一點可以舉一個例子：圖書艾爾夫特城的保爾謝弗爾制鞋厂，在一九五四年总共訂立了二、七五四个銷售合同。到十月底這些合同中就有一、三三〇个改變了。在四八三个供應合同中，到十月底也改變了一八六个。這個圖書制鞋厂的領導在解釋這種情況時嘆氣說：“我原以為我們是在製造鞋子的，可是實際上我們却在製造合同。”國家合同裁判所的一次調查證明，企業本身要求變更合同的數字比由於政府採取措施所引起的變更和取消合同的數字要少。希望隨著簡化計劃的決議的貫徹在這個方面也能有很大的改進，從而使企業的生產過程不會間斷。由於將來在這些企業中着重實行季度計劃，在這一方面也會減少困難。

因為企業對自己的企業計劃要完全負責，所以這些企業計劃的質量也要由自己來改進。這些計劃必須以正確的材料與勞動力的決算為基礎。而這一點只有在企業內有了正確地、科學地計算出的而且是先進的標準才有可能。沒有精確的標準就不可能有精確的企業計劃。如果沒有精確的材料消耗標準，那麼材料需要計劃就只好按照經驗或“用大姆指來測定”了。在最近几年中，我們對確定標準問題是有進步的，但還不能令人滿意。使用機器、電力和材料消耗等標準的科學計算，在長時期內，仍然是改進我國計劃工作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對於這一點有一個例子：

重工農部報告說，大約有百分之九七的原料合乎材料消耗標準，這雖然是一個良好的情況。但是又證明，這個數字包括三種不同的標準：1. 有技術根據的標準，2. 經驗統計的標準，3. 在剛開始生產時，以利用其他企業的資料為基礎的標準。實際情況是，在電力、煤氣和人造織物方面只有經驗統計的標準；在鋼鐵工業中，有技術根據的標準和經

驗統計的标准的比例是二一比五四九。在重工業化學方面，同样的比例是九一比一、四五二。在总数八、〇八九个材料消耗标准中只有六六七件有技术根据，而有七、二五八件是經驗統計的标准。

当我们說到标准是精确計劃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时，当然我們經常是指有技术根据的标准。这种标准是和先进的生产条件相适应的，它督促企業动员一切潜力并以各种方式节省社会的劳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計劃不仅包括社会主义成分，而且牵涉到其他成分。例如每一个农民都有耕种計劃和飼養牲畜計劃，此外还有义务上繳农产品的計劃数字，这些主要是用来規定他的生产計劃的。这种对于私营农業生产的干涉，在过去和現在都是必要的，为了人民的粮食，必須保証絕對需要的农产品的生产。这种干涉在原則上是有效的，而且对农民是有利的，因为这种干涉保証了农民产品的銷售。这种农業生产計劃的缺点在于：好事做得太多，不必要地限制了农民的經濟創造性。例如国家計劃中的耕种計劃包括了一百种以上的各种作物，这是由中央机构計劃的，因而对各个农民經營作物的規定，有时达五十种至七十种，这就大大限制了农民生产的創造性，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在国家利益和农民物質利益之間引起了某种矛盾。农民的理想耕种計劃，在这种过度集中化的情况下，是很少得到充分照顧的。可是这种方式的計劃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因为这样集中化的計劃，对各个地区天然的与經濟的生产条件当然就不能很好地照顧。这种制度对于公共利益有着怎么样的害处，可由下列例子來證明：罗斯托克行政区一九五五年規定每头母牛的平均产奶量为二、九〇〇公斤。罗斯

托克行政区又把它机械地分配到各个县。这样，格雷費斯米倫县在一九四五年早已平均达到了二、九〇〇公斤，又再得到只有二、九〇〇公斤的計劃任务。

農業生產計劃中的形式主義使天然的生產潛力不能被充分地發掘出來，而且不能把農作物和牲畜的生產計劃互相協調起來，因而使按比例發展的規律與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規律受到了妨害[⊖]。

要改進農業生產計劃，就要對天然的和經濟的生產條件，制訂出精确的科學的參考資料，通過限制最主要的产品來簡化計劃，同時在農業中推廣合同制度，以及提高計劃干部的質量。關於價格問題我在以後再講。

雖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私營工業和手工業企業沒有經營計劃，它在生產中同樣也受到國家計劃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通過行政區和縣的委員會以及工商會來發生的。私營企業向這些機構提出它們的生產供給計劃，而這種供給計劃要受到與總的經濟任務相適應的影響，以便生產更多的人民群眾的必需品，更多的貴重出口物資，更多的建築材料和工業新产品等等。私營企業的計劃草案由行政區委員會使之和增長速度的控制數字以及和材料的增長（國家的限額和地方潛在力量）相平衡。行政區委員會把控制數字和材料限額交給工商會的行政區理事會，由它負責保證完成國家的任務。

私人資本主義工業與國民經濟相聯繫的重要方法，是國營工商業企業和私營企業訂立合同。國營經濟支配著大量的物資，而大部分私營企業只是給這種物資加工，因此國

[⊖] 現在已經廢除了飼養牲畜計劃，並且準備廢除耕種計劃。保留采購和收購計劃，這就是說，用市場生產計劃來代替總產量計劃。

营成分手中掌握了有效的經濟杠杆，来影响私人資本主义企業，并排除它的有害因素。但是这种杠杆显然沒有被国營經濟充分利用。只有这样才能說明私营企業为什么拒絕參加合同接受供应条件，拒絕遵守履行合同的期限，以及拒絕規定在不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要受到处罚。目前我們共和国的情况是，私营企業遇到履行合同有困难，比国營企業所处的情况要有利很多，因为它沒有强制的协定。这种情况是荒謬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国營經濟的干部还不了解，这个最重要的經濟杠杆是完全掌握在他們手里的。

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私营企業通过一般的商品流轉和工农国家的財政政策，总是要处在社会主义經濟的影响下的。由于这一切情况，資本主义成分的竞争和生产無政府状态的規律大大地失去了效力，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却超出了社会主义成分之外。○

正如“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所指出的，实际上各种計劃并不是时常和国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的要求相符合的：

“当違反了这些要求时，由于國民經濟各个部門的比例失調，由于正常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遭到破坏，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便显露出来。”○

这对于發展社会主义所作的規定，当然在更大的范围内适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內还存在的經濟。如果把我們的經濟和西德比較，我們就可以确定，我們已經大大地縮小了竞争和生产無政府状态規律的作用范围，我們把这个規律的作用，失業和危机从我們的

(○) 由于工农国家参加了各个私营企業，給这种作用产生了一种新的情况，这种情况需要进行詳細的分析。

○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頁。

經濟中排除出去了。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過渡時期內是有商品生產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商品生產的必要性是由于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不同的經濟成份的存在而產生的。它是非常需要的，因為個人需要的物品都是作為商品來生產和銷售，最後，在對外貿易中就是买卖商品的。

哪里有商品生產，哪里就有價值規律。價值規律的作用使得貨幣成為必要。貨幣仍然是價值的一般尺度——整個社會生產的產品都是以貨幣來表示的。因而貨幣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最重要的經濟工具之一。

我國經濟學界對於價值規律作用的討論，常常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錯誤，而使對這個複雜問題的了解更加困難。

大家都知道，按照馬克思的話來說，價值就是勞動，就是私人生產者的勞動，這種勞動應該認為是社會性的勞動，是社會全部勞動的一部分。在社會主義生產中，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已經消除。勞動不是私人的，而是直接的社會勞動。目前有些經濟學家即由此推論出一種在利用價值規律中的自動主義：勞動只需要加以計劃，它就作為直接的社會勞動而創造價值了。例如萊比錫的約翰尼斯·史密特這樣寫道：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勞動力一開始就計劃好了，它是直接的社會勞動。在這裡表現了價值規律的自覺運用。”^③

但是，如果計劃錯了，或者勞動力生產了所謂超計劃的部分，而完全銷售不出去，那會怎樣呢？顯然，在這裡，個人勞動並沒有被當作創造價值的社會勞動的一部分，而是

③ 約翰尼斯·史密特：“經濟核算與徵稅”，“經濟問題討論文集”，第七分冊，第29頁。

無謂地消耗了。因此我要說，即使在社会主义經濟中，價值規律的利用也不是像人們有所想像的那样自動地進行的，而是要求有計劃地分配社會勞動，這種分配是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要求相適應的。

與此相反的另一個錯誤，在我們的經濟學界中也不是少見的，就是高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經濟中的價值規律的基本的調節作用。我想在這裡舉出荷斯特·齊默曼的“居民貨幣收支的決算”一書為例。齊默曼斷言，居民間的貨幣流通是受價值規律調節的^①，即“現金在一方是企業，另一方是居民之間流動”是屬於價值規律的作用的^②——國營企業對工人支付工資也是一樣——以及其他等等。顯然，齊默曼高估了價值規律在我們共和國經濟中的自發作用，而沒有充分地估計到許多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是限制了價值規律的作用範圍的。

當然，價值規律在商品流通中，還在一定範圍內起着調節的作用。在各種商品的供給與需求之間起作用，而商品的供給與需求則依價格而定。但是就是在此——在流通範圍內——價值規律並不能自由地發展，因為，社會主義成份按照固定價格大量地供應商品。即使在農民市場上，本來是自由定價的，但國家的固定價格也擴大了它的影響。

在簡單商品生產成份中，價值規律作為生產的調節者起着作用。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它的自發作用被限制在十分狹隘的——可以說是過於狹隘的——範圍之內。因為生產力的分配，例如在農業中是以耕種計劃和飼養牲

^① 荷斯特·齊默曼：“居民貨幣收支的決算”，“經濟問題討論文集”，第15分冊，第68頁。

^② 同上書，第72、79頁。

有計劃的根據的，並不是自發地通過價值規律。凡是我们不了解正确地运用價值規律的地方，那里虽有計劃，还会發生紛扰。

在我國經濟的資本主義成份中，價值規律作為生產的調節者的作用稍為大些。資本家在我們這裡也只為了利潤而生產，并且努力生産能够获得最高利潤的商品。即使是对这个成份，工农国家仍然要借助于它們的經濟杠杆加以干涉，因而限制了價值規律的基本作用。

價值規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經濟的主要意義，在我國發展的現階段上我認為是經濟核算的应用，這就是說，在社会主义成份中自觉地运用價值規律，以貫徹省約，并爭取所有社会主义企業的利潤。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第二十一次全體大會正是把这个問題——爭取和提高利潤——作為所有經濟措施的核心。目前它是我国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的环节。但是，如果我們不学会自觉地运用價值規律，我們怎么能掌握这个环节呢？瓦爾特·烏布利希在第二十一次全體大會上說道：

“當經濟核算利用價值規律時，它就顯示了這種可能性：精确地計算，忠實地記帳，以及經常地檢查企業的經濟活動。”^Θ

生产成本的精确計算，正是利用價值規律來推斷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這是爭取利潤道路上的第一个決定性步驟，這是清算帳目以及檢查的絕對前提。

与此相关联的，我們就不能放过古爾特·台希曼錯誤的而且对我国經濟政策有害的理論，他在研究社会主义的价

^Θ 瓦爾特·烏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學問題”，第10—11頁。

值的形成中虛構了一個所謂計劃價值。台希曼的這個計劃價值的涵義如下：

“計劃價值無非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一種產品的、用價格形式來表示的、有計劃的生產費用。”①

台希曼十分明白，他的計劃價值是和客觀價值不同的，這種客觀價值的大小，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是以生產商品時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確定的。台希曼明確地承認了這一點，他強調說：“各個商品的客觀價值愈來愈會失掉它的重要性”。只有在一切價值的總數中，他才承認客觀價值。台希曼的理論無非是重複了主觀唯心主義所表述過的。如果運用他的理論，必然徹底地消滅了經濟核算和任何精確計算。台希曼完全忘記了斯大林的重要指示，即考慮到價值規律之所以好，是因為它可以教會經濟工作人員：

“……計算生產量，精確地計算生產量，並且同樣精確地估量生產中的現實事物，而不去侈談憑空想出來的‘大概數字’”。②

價值規律在新的條件下也不失掉它的客觀性，所以在我們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中正確運用價值規律，是在我們其他經濟成份中正確而有效地運用這個規律的前提。正確地在社會主義成份中運用價值規律就是說，借助於它來精確地確定社會勞動的實際消耗，並相應地根據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來正確分配社會勞動。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實現要求系統地並且迅速地

① 古爾特·台希曼：“關於國內貿易的經濟學”，“經濟問題討論文集”，第5分冊，第52頁。

② “蘇聯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頁。

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束缚解开后，在社会主义中就产生了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经济规律并起着作用。这个规律对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具有非常的重要性的，就如列宁所教导的，劳动生产率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因为它创造了比封建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在资本主义中，因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于危机和倒退是间断的。社会主义将战胜资本主义，因为它创造了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新的经济规律。

当然这个规律也不是自发地发生作用的。并不是我们袖着手就能够看到这个规律是怎样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恰巧相反，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规律正是要求我们为争取它的实现而积极斗争。这个斗争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这个规律。

应该承认，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实质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是清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在产品中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而过去劳动的份额相对增加，但包含在单位产品中的劳动总量减少了。”^①

这个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公认的论点驳斥了汉斯·海塞尔在“经济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所代表的见解。他认为，物化劳动的份额对活劳动份额的减少也表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海塞尔写道：

①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8页。

“毫無疑問，那种共同的規律性对于这种比例是有作用的，它将無疑地会影响总产品中的物化劳动的份額提高。但是这方面也不能忽視其他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总产品中的物化劳动的份額不断降低：这就是我們的工人，他們不断地在爭取节约材料，減少机器的損耗，用廢物来制造貴重的消費品等等，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績，因而使物化劳动的份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年計劃的过程中不断地降低了。”①

我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产品价值中的物化劳动份額的确是降低了，在我面前的这些資料是很不精确的，但还是說明了这一点。然而海塞尔的說法是錯誤的。他想把坏事說成是好事，从而維护了落后和懶惰。的确，节省物化劳动，节约材料，注意保护机器等等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附加的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节省活劳动，是以同样数量的活劳动的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这通常是需要更多地花費物化劳动和更好的生产工具的。如果在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現的是一种相反的情况——而这在許多工業部門的確是發生的——那末这只是說明正是从活劳动方面所达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不够的。無可爭辯，在我們这里劳动生产率沒有和技术的提高保持一致的步調。舉例來說，假如推行一种新的技术，但沒有同时实行相应的新的工作定額，这样就缺少对节省活劳动的督促，并且也就可能会發生海塞尔所維护的这种情况了。

馬克思所指示的，产品价值中的活劳动份額減少的情况一定会出現，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改进技术，运用

① 汉斯·海塞尔：“关于社会生产中两大部类的增长速度的問題”，“經濟科学”，1954年版，第6册，第654頁。

最新技术和最新科学工作方法是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的手段。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使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枷锁里解放出来。逐年都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来发展以最新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与此相关联的我国国民经济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是投资的效果。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更廉价地制造新的生产设备，避免不必要的设计费用，在各个方面降低工程造价。例如由于仔细地审查了煤炭工业的投资计划，结果立即就可以从两亿马克中去掉六千六百万马克，而不降低投资的效果。另一个任务在于，执行一种能够使新设备尽量迅速地投入生产的投资政策。如果同时开始许多长期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有时連續几年完成不了，这样就給国民经济带来了损失，并且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为此已經為它創造了“投資的廢墟”这个名詞，这个名詞是对我們的投资政策的一个严厉的但是公正的批评。應該做到，使比較少量的投资项目在短时期內結束并投入生产。这不仅适用于工业，而且适用于一切投资。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重要手段是改善企業中的劳动組織，特别是物资供应和协作企業的合作。断續的生产是会使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到目前經常出現的实际情况是，到月終、季末和年終时就以加班加点来完成計劃，然而到下一阶段开始时，生产由于缺少材料而陷于停頓，这种情况严重地妨害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于简化計劃的决定使企業也就有可能不断地無阻碍地进行生产。

然而，如果没有精通技术和組織的人，那末改进技术和劳动組織也是空談。马克思說，在这些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中占首要位置的是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这并不是偶然

的。工人的業務知識，而最根本的群众的文化水平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关系到劳动群众的認識問題。劳动群众的新的認識表現在爭取完成生产計劃，提高劳动产量，降低成本，改善質量等等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广泛的运动中。社会主义竞赛是發展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杠杆。絕對不能把竞赛只是限于完成生产計劃，竞赛必須涉及所謂的計劃的质量指标，涉及生产的質量，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潤。目前工作中的缺点也在于，这种竞赛經常由个人义务代替了，而对这种个人义务的实现很少进行檢查。个人义务还不是竞赛。这就必須組織有具体任务的企业对企业、小组对小组而主要的是个人对个人的真正的竞赛，同时規定严格的檢查。

工作定額对于爭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有重大意义的。先进的有技术根据的工作定額的意义在于，要使工人从物质利益上來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組織同志式的帮助所有的工人就可能都完成規定的定額并且还超过一些，从而使生产率得到普遍的提高。規定有技术根据的先进的定額不仅为制訂精确的劳动力計劃所必需，同时它也是利用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規律的前提。不正确的、太“软弱”的工作定額，即使技术發展，也是阻碍規律發生作用的。如果在各个工业部門，例如在汽車和拖拉机制造業中，平均完成了工作定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那末，不用进行任何詳細分析就可以說，这里的定額是不正常的。此外，各个工业部門中完成定額的平均数字是很不一致的。消費資料工业完成百分之一百另五到百分之一百十，电机和工作母机制造業是百分之一百三十五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在这方面應該注意到，这里指的是工业部門的平

均數字。而在各个企業間和企業內部的各個部門間還有着很大的區別。這種區別也就說明了，在我們這裡，工作定額還是不正常的。

引起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可以到這裡來找，即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中有技術根據的工作定額還總是太少。在機器製造工業部系統內，在一九五四年年底有技術根據的工作定額只占百分之二十六。在重工業部系統內，在一九五四年年底有技術根據的工作定額占百分之三十六，預先規定時間的定額占百分之三十一。也就是在這個部里有一些企業平均完成了定額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到百分之一百六十五。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第二十一次全體大會再一次着重指出，制訂有技術根據的工作定額是提高利潤的前提。

引起過高地超過定額的另一原因是，對於完成定額實際消耗的工作時間沒有精確的檢查。這種情況也不少，即為完成定額實際進行工作的时间是作為等待時間來記錄的，因此完成定額的時間算得太短，完成定額數字就大大地提高了。這種“定額的搖擺不定”嚴重地妨礙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須迅速通過嚴格的檢查，特別是工長的檢查來消灭它。

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仅仅決定於一種新技術的推廣是錯誤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可以而且應該通過改善對現有技術的利用，特別是改進工作時間的利用來達到的。正是在這方面，在我國的國營經濟中還有着巨大的潛力沒給發掘出來。加強勞動紀律，反對磨洋工，增加產業工人對職員的比數在這裡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只要減少所有各種為與生產無關的工作而使用的工作時間，就可以大大地提

高劳动生产率。

为使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能够有效地进行，必须要有稍微精确些的对劳动生产率的测定。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当然是根据使用价值来测定。例如，蔡兹氯化工厂一九五〇年时每个生产工人生产的轻油为一一五六吨，一九五四年是一六六点六吨，这样很清楚，我们是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但是在生产各种各样机器和工具的机器制造业中，情况就要复杂得多。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情况还更要复杂。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是用按标准价格计算的总产量除以当时组内的工作人员数来进行的。这种计算方式至少包含有两个不可靠性的因素。首先，总产量的概念绝对是不清楚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九五三年曾进行了一次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虽然有许多人开了炮^②，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弄清楚。其次已经证明，目前所有的标准价格都不是可靠的见证人。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所分析的社会主义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数字就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明力了。在这方面也必须很迅速地改进测定的方法。而我们的经济科学工作者们在最近几年中正是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很多好的理论的准备工作，因此我认为，立即改进方法的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

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过渡时期的条件下，这个规律仅仅在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份中才起作用。由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大力帮助，这个规律也已经在小商品生产成份中，至少在农業中發揮它的作用了。在我

② 参看马尔加斯德·施密特“在通常工业总产值中的问题”，“经济問題討論报告”，第12册，第27頁。

國的條件下，這個規律也使個體農民在他們的私有經濟中有可能，通過全面地利用國家的幫助而不斷地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而在這一方面用各種辦法來幫助他們也是我們的任務。當然，這個規律在這個成份中是不可能像在社會主義成份中那樣充分地發揮其作用的，然而這個規律在小農經濟中的利用和在利用這個規律中所暴露出來的小農經濟的局限性將是使個體農民相信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優越性的另一個辦法。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規律的愈益增大的作用是我們爭取德國恢復統一的民族鬥爭中的一個巨大的積極的因素。在西德，提高勞動強度來加強剝削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手段，這種提高極不平衡，隨之而來的是人民群眾的狀況愈益惡化，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勞動生產率在新技術、更完善生產方法和工人的文化和業務知識增長的基礎上，得到了逐步的不斷的提高，同時勞動人民的狀況也不斷地得到了改善。在這裏也就顯示出我國新的生產關係的優越性。

在過渡時期產生並擴大的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產生了新的分配關係。這就發展了按勞分配的經濟規律，使它成為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中的工資政策的基礎。在這方面利用了勞動人民從物質利益上關心自己的勞動成果的原則。“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寫道：

“按勞分配的經濟規律要求直接按每個工作者的勞動數量和質量來分配產品，要求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不分性別、年齡、種族和民族，一律實行同工同酬。”①

①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頁。

运用这个社会主义經濟規律的基礎是，勞動力在國營成份中已經失去了它的商品性質，並且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消失。工資成了用貨幣來表現的社會總產品的份額，它按勞分配給勞動者供個人消費。工資的貨幣形式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工資能够根據勞動量而有足夠的差別。在社會主義成份中，勞動工資有着各種形式，如計件工資、計時工資、獎金，這一切形式都是符合于或者應該符合于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哈利·馬特爾因此在他的著作“勞動量原則是國營經濟中支付工資的基礎”中建議，“按勞動量計算工資”這個概念不再是从以往通常的同計時工資、獎勵工資相區別的意義上來運用，而是以此來表示在國營經濟中工資的實質已經改變了^①。雖然這個建議本身從理論方面來講是有些道理的，因為社會主義的勞動工資的性質和資本主義的是有原則上的區別的，但是我不認為馬特爾的建議是可以採用的，因為他抹煞了社會主義中各種工資形式間的區別，而這種區別對於利用按勞分配規律正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區別之被抹煞是在馬特爾解釋“按勞支付工資的最低級形式是計時工資”^②的時候。的確，計時工資可以說是最低級形式，但是在我們的條件下還不是。發展我國工資制度中的主要任務在於尽可能廣泛地用計件工資來代替計時工資，這種計件工資在我們這裡被稱為真正的計勞動量工資。在這種情況下把計時工資解釋為計勞動量工資這只會引起混亂，而离开了主要任務。

在說明過渡時期的勞動工資的性質時應該考慮到，按

① 哈利·馬特爾：“勞動量原則是國營經濟中支付工資的基礎”，柏林1954年版，第7、80、153頁。

② 同上書，第80頁。

勞分配的規律即使在社會主義成分中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實現的，因為有舊的工資制度存在，這種工資制度大多數是幾十年來階級鬥爭的結果，並不是一下就可以廢除的。這樣，我們在國營經濟中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的繼承者還帶着舊的地方等級制度的殘余，這種殘余顯然是和按勞分配的規律不相容的，但是只能逐步地加以消灭。充分利用按勞分配規律的基礎在原則上是清楚的，但也只能慢慢地、逐步地建立起來。

與工作能力、勞動繁重情況和責任以及各個生產部門的國民經濟意義相適應的勞動工資的差別是通過工資率制度和工資等級來實現的。為使這種差別真正符合於按勞分配的規律，就有必要實行工資等級表，在表中明確規定各個工資級別的工作特點。因為我們今年（一九五五年）才能開始逐漸實行經濟部門的工資等級表，所以目前在我國的國營經濟中還存在着一種經常和按勞分配的規律起衝突的定級制度。

在工資等級表的基礎上，必須在考慮到必要的差別的情況下規定各個經濟部門中的每一個工資等級的基本工資。就在這一點上，我國的經濟中還存在許多違反按勞分配規律的情況，特別是在支付貿易工作人員和技術人員的工資時，對於這些人員沒有統一的、具體的工作特點，而且在各個經濟部門中的工資等級數字竟在四和十四之間變動！因此在實際工作中任意地規定薪金的情況並不是少見的。

目前和計勞動量原則截然相反的情況往往是，工資等級比較高的工人的平均的按勞動量的工資比工長的工資高，而這些工人是在他們的管理範圍內工作的。

而且各个工資等級中的差別在一些工業部門中也是不正常的，特別是，就如馬特所指出的，在建築部門和造紙部門中。例如，在建築業中，工資等級五級和六級之間的差別是二四个分尼，而在工資等級七級和八級之間的差別只六个分尼。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造紙部門，精制陶器業和玻璃工業部門中①。

如果有了正确利用按勞分配的規律的基礎，那么也就可能根據這一規律的要求來規定企業集體合同中的具體條件。

然而一个拿按劳动量計工資的工人的實際收入不仅根據他的按工資等級的基本工資，而且也根據他完成工作定額的情況來確定。從這點來講，如果定額不恰當，那麼即使工資率制度完全正常，也會損害按勞分配的規律。在一九五三年工資等級一級到四級的工資提高後，我們在造紙工業中發現，工資等級三級和四級的工人由於完成定額較多，收入比因為在大型制紙機器旁操作而只能超額很少的工資等級五級和六級的工人要多。為了不致損害按勞分配的規律，必須經常研究各个工資等級中的定額完成情況。

工作定額並沒有按工作質量來區別劳动工資的國民經濟的職能。這是通過工資率制度來實現的。工作定額的目的是尽量正確地按每個工人實際進行的工作的數量和質量來區別工資，並促進劳动生產率的提高。這裡應該注意到，在工資率制度中確定的差別不會由於定額錯誤而和它相反的。在檢查定額完成情況時必須特別注意產品的質量也要符合於規定的條件。

① 哈利·馬特：「劳动量原則是社會經濟中支付工資的基礎」，柏林1954年版，第73頁。

如已經提到的，在不可能实行按工作定額的計件工資的情况下，計时工資通过奖金来弥补。即使这样，計劳动量的原则在过去还是經常遭到破坏，那就是机械地按固定的計劃而絲毫沒有考慮实际的劳动量来分配季度奖金。由于部长會議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作出关于支付国营企業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工长和商業領導人員的奖金的決議，在这一方面将来也会更好地符合于按勞分配的規律。

实现按劳分配的規律必須和任何平均主义的作法作坚决的斗争，使得每个人真正取得符合于他的劳动量的报酬。但是它也坚决要求工資和薪金有一个正确的差別，它要求同样的劳动量取得同样的工資，比較高的劳动量取得比較高的工資。而这个要求，就如我所指出的，在我們的国营企業經常是被忽視的。例如，在同样的企業里对于同样的工作却有不同的定額，因为一个先进小組决定“自願提高定額”，这完全是不許可的。如果变更定額，那末就應該对所有从事同样工作的人都有关系。

不論性别、年龄、种族和民族，同样的劳动取得同样的工資的原則在我們的国营企業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劳动工資和劳动生产率之間有着紧密的相互关系。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是不断提高工資的基础。这种关系必須經常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优先于工資的增长，否则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發展。

目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私人資本主义企業中的劳动工資的情况如何呢？在这种企業中的工人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只有从过渡时期的条件中才可能理解。这些工人一方面是属于占統治地位的工人阶级，是社会生产資料的共有者。而另方面他們还是把他們的劳动力作为

商品出卖給私營企業主，承受剝削和生產剩餘價值。如果否認了資本主義成分中的工人還是把他們的勞動力作為商品來出賣的，這就是否認了這個成分的資本主義性質，因為把勞動力作為商品購買是把貨幣變為資本的決定性的條件。但是，雖然在這個成分中的勞動力還是一種商品，它的價格，即勞動工資，却不再由資本主義工資規律來決定，而是受新的社會關係影響的。由於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不再存在產業后备軍和周期性的發展，為決定私人資本主義成分中的工資產生了新的經濟條件。就如馬克思所說，在這種工資里也摻入了道德的和歷史的要素。社會主義成分中的工資關係，工農國家的法律規定以及工會力量使工人的要求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得到了實現，它們對於資本主義成分中的工資起着巨大的影響。因此私營工廠中的工資比相當的國營企業的工資只低很少。至於實際工資，私營工廠的工作人員從降低價格等等方面享受著和所有其他居民同樣的好處。資本主義貧困化的規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資本主義成分中也已經失去了它的作用^⑨。

在農業方面，按勞分配的規律已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中運用，收入的最大部分（第三種類型社是百分之八十）按所做的勞動單位分配給合作社社員。在合作社的收入中也還存在一種級差地租，這是由於土壤的肥沃程度不同或位置有利而產生的（級差地租 I），或由於追加投資而產生的（級差地租 II）。一部分級差地租由國家用有差別的義務上繳的辦法根據土壤等級抽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因為還存在着土地私有制，所以也還存在一種絕對地租的形式，這種

⑨ 由於工農國家參加了各個私營企業，對於這些企業中的工人也產生了一種新的情況，這種情況同樣也還需進行經濟分析。

地租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是根据入社的土地份额分摊的。絕對地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繼續存在是和土地的私有制的繼續存在有直接联系的，由于制定农产品价格的复杂性产生了一个困难的經濟問題，这个問題要求进行一种徹底的科学分析。确实，这件事情并不像汉斯·鮑歇尔特所說那样簡單，他的結論是，由于土地占有者和直接生产者的分离的消除，在农民經濟中的絕對地租也就不存在了○。在任何情况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地租和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义的地租是有原則上的区别的。發現它們的特殊的社会內容，将是一种理論研究的最重要的任务。

按劳分配的經濟規律是不断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的基础，它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产生和發生作用进一步地証明了新的社会关系比在西德重新建立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关系优越。

过渡时期的复杂問題之一是国民收入。这里就不能只限于研究社会主义成分，因为在創造和分配国民收入方面是有一切成分参加的。一般來說，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补偿了所消耗的生产資料后剩余的，它体现着新消耗的劳动。国民收入只是在物質生产領域內才被創造出来。而物質生产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包括現存的三个經濟形式的。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收入是由下列几个部分构成的：

在社会主义成分中是归自己的劳动产品以及归社会的劳动产品；

① 汉斯·鮑歇尔特：“卡尔·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及其在各个不同經濟形式中的运用”，哈勒—威丁堡，馬丁·路德大学科学杂志，1951年至1953年，第6册，第232頁。

在小商品生产的成分中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物，只是这些剩余物并非由于服务而产生的。

在资本主义成分中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国民收入的多少决定于生产的领域和生产率的水平。因此，扩大国民收入的手段也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作人员数字。在社会主义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扩大国民收入的决定性的因素。

国民收入按其实物形式可以分为消费基金（这是用作消费的）和积累基金（这是用作扩大生产或其它投资的）。

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直接交给它的直接生产者的手里——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就是把工资交给工人的手里，把剩余物交给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手里，把利润交给资本家的手里。一部分国民收入以税收或上缴的形式交给国家。此外，社会主义企业的赢利也归国家所有。

集中在工农国家手中的这部分国民收入是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通过党和政府的决议来分配的。这里必须注意到，即使留在直接生产者手里的一部分国民收入，也是通过工资政策、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受统一分配约束的。

分配国民收入最重要的工具是国家预算。国家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是：1. 社会主义经营的收入，这不是作为生产上缴就是作为利润提成而缴入国家预算，即国家集中的纯收入；2. 由其他成分和居民交纳的税款。

国家预算的主要任务包括供给国民经济、社会文化设施、国家行政机关和国防建设以资金。

最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财政政策方面进行了几项重要的改革，以便促使企业利润的提高。这些改革所涉及的，首先是推行和产品相关的有差别的生产上缴，特别是在消

費品工業中，它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使任何產品的製造都獲得利潤，和加速把社會的這部分產品上繳國家。其次允許社會的產品的另一部分作為企業純收入（贏利）在企業內部完成企業的投資任務，补偿流动基金和充作經理基金，以使全體工作人員從物質利益上关心完成贏利計劃。

在和國家預算密切关联的社会主义成分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的財政制度。它的产生是由于，一切社会主义企業的生产結果都是以价格形式來表現的。社会主义財政制度是按計劃构成和分配貨幣基金的一種涉及面很广的制度。由此就產生了进行財政控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通過馬克來控制。这种控制在企業內是通過會計制度來實現的，即通過對比支出和收入，以確定每一件产品的費用，并使計劃費用和實際費用相平衡。对于企業的通過馬克來進行的控制，總會計師負有主要的責任。其次，合同制度中的財政控制通過相互檢查而得以實現。再其次是由發行銀行借助于短期貸款、現款流通和無現款的結算來進行財政控制。由於發行銀行控制企業的財務活動情況，它就有可能迅速發現生產過程中發生的困難。另一个控制工具是國家的財政机关，由它們控制流动基金和利潤，最后是由德国投資銀行控制投資消耗和折旧基金。

貸款是促進社会主义生產的重要手段。它的主要作用在於，動員一切從社會基金循環中產生的暫時空閑的資金，並為社会主义再生產進行分配。因而貸款就成了檢查國民經濟計劃中規定任務的完成情況的重要工具。

在社会主义成分中，企業的財政控制由部的机构、國家預算和發行銀行直接進行。但是如果這種控制沒有成為勞動群众的事情，那麼這種控制也是不夠的。因此瓦爾特·

烏布利希在德國統一社會党中央委員會第二十一次全體大会上要求，企業中的黨和工会組織不仅要从事完成生產計劃的工作，而且也要檢查財政計劃的執行情況。上述的財政政策方面的新措施保證了勞動者從直接的物質利益上关心財政計劃的完成。現在的任務是在於，幫助勞動者正確地了解財政政策問題，這個任務也是經濟科學工作者必須共同擔負起的。

在這兩種私營經濟成分中，通過馬克進行控制只可能是一種間接的控制。除了通過國家稅務管理機關控制外，發行銀行還可以通過使所有年營業額超過二萬馬克的企業必須開立銀行帳戶和從它們的銀行里取得現金限額的規定來進行控制。所有超出限額的資金必須交付給銀行。由國家銀行檢查這一規定的執行情況。

對私營企業的另一種控制是通過短期貸款來進行，這種貸款是私營企業大規模生產和流通所需要的。這種貸款的許可受一定條件所約束——生產要合乎國民經濟的利益，貸款用途的限制，擔保，按期歸還及其它——，由銀行檢查條件的履行情況。

最困難的是在小商品生產者中實行財政控制，因為這些小商品生產者並沒有開立帳戶的義務。只有在這些企業需要短期貸款時，才可能進行財政控制。雖然可以對這些企業作某些有關國民經濟計劃方面的控制，但如前所述，這種控制幾乎不能對於這些企業的財政管理有所約束。

國民收入的分配和社會再生產問題有著直接的關係，因為把已經知道數量的國民收入分為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直接決定了積累的速度，即決定了擴大社會再生產的速度。社會再生產的問題只有在馬克思所闡明的再生產理論的基

础上才能得到解决，就是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以及根据马克思所阐明的规律，即在价值补偿与物质补偿的必要性上才能得到解决，即使这项价值仅用于计算目的。

再生产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生产资料生产(第一部类)同消费资料生产(第二部类)的比例。马克思所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规律，即 $I(v+m)$ 必须大于 IIc ，适用于任何一种扩大再生产，适用于资本主义的以及共产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同样也适用于过渡时期。除去为了克服不合比例的暂时例外情况之外，这个规律始终都在发生作用，即在扩大再生产时，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一定要比第二部类较快地增长。

虽然这个规律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联系到新政策的实施时，竟对这个规律加以否定，而断定，如果第二部类即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比第一部类快，扩大再生产也是可能的。

早在一九五三年汉斯·海塞尔曾经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决策”，即曾显露出他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理解是不足的。首先，海塞尔不是同马克思一样从把总产品分成两个部类出发，而从价值构成的 $c+v+m$ 出发，然后再研究两个部类，在处理两个部类之间的关系上，海塞尔也和马克思相反，不是把第一部类，而是把第二部类置于领导地位。最后，海塞尔得出结论：

“第一部类的增长和第二部类的增长之间的发展比例必须是这种情况，即第一部类暂时地比第二部类增长得快。”^①

显然这个“暂时”是意味着通常第二部类應該增長得快些。

一九五四年年底，海塞爾在“經濟科學”雜志中進一步發揮了他的“理論”，他的主張是：

“第一部类的优先發展絕對容許第二部类更快地增長。”①

在另一个地方他綜合了他的說明并写道：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第二部类比第一部类增长得快，社会扩大再生产还是絕對可能的。”②

汉斯·海塞爾的这种見解显然是和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相矛盾的，并且歪曲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实施的經濟政策。

一九五四年八月在“实用統計”杂志开始了一次关于扩大再生产的討論，这次討論由工學士馬丁·舒伯工程师开头。舒伯試圖用第二部类更加迅速增长的論点來證明新政策的持久性，这样必然就把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倒置起来。他写道：

“即使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比第二部类較慢，而扩大再生产还是絕對可以进行的。但积累份額在任何情況下都会相应地減少……”③

舒伯試圖用許多非常复杂的計算來證明他的理論，消

① 汉斯·海塞爾：“国民经济計劃中的決算”，“科学問題討論文集”，第11期，第14、15頁。（着重點是我加的——弗·施期納）。

② 汉斯·海塞爾：“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的增长問題”，“經濟科學”，1954年第6期，第643頁。

③ 同上。

④ 馬丁·舒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論”，“实用統計”1954年第8期第115頁，續稿和結論在第9期和第10期。

然他把这些計算只应用在两个生产循环上，而沒有考慮到，如果积累份額減少，这种扩大再生产可以进行多久。

赫伯特·沃尔夫在同一刊物上对舒伯提出了批评，虽然他对舒伯的錯誤論点进行了駁斥，但是这只是同一理論的一种新变体。沃尔夫把从扩大再生产引出的第一部类增长較快的必然性，一律称为是馬克思再生产理論的庸俗化。他认为在扩大范围的扩大再生产（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和提高强度的扩大再生产（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情况下）之間應該有所区别，他写道：

“这里，生产資料的生产比消費資料的生产增长較快的規律完全是以提高强度的扩大再生产为基础的。”^①

因此第二部类較快地增长是可能的，人們應該把扩大范围的扩大再生产处于从屬的地位！沃尔夫在他的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再一次明确地証实了这个論点，他認為，从扩大范围的扩大再生产的觀点來說，第一部类必須較快地增长是荒謬的^②。不可思議的是，沃尔夫在二月份的一期中結束他的文章时，却作出了确切的結論，对于这个結論我也同意：

“第一部类較快地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共有的經濟規律。”^③

句点。完了！再也沒談到扩大范围的和提高强度的扩大再生产。难道这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嗎？

讓我們从事情本身来看一下，这不用圖表和冗长的計

① 赫伯特·沃尔夫：“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論的几个实际問題”“实用統計”，1954年第12期，第178頁，續文在1955年第1、2期。

② “实用統計”，1955年，第1期，第12頁。

③ 同上文，第2期，第29頁。

算就可以非常清楚地說明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指出，只有當第一部類的新產品大於第二部類的固定資本時，換句話說，即只有當生產資料的生產多於消費時擴大再生產才有可能。但生產資料只能在第一部類生產。而第二部類只有當第一部類供給它必要的生產資料時，才有可能增長。否則就絕對沒有這種可能，因為第一部類不僅生產生產工具，而且也生產原料和輔助材料。但是沒有一個熱烈主張第二部類優先增長的經濟學家提出過這個簡單的問題，如果第二部類不能從第一部類得到必需的補充的生產資料，第二部類如何能夠增長呢？這個簡單問題簡直就沉沒在大量數字中了。沃尔夫打賭地說，如果在第一部類降低生產資料的積累份額，第二部類可以增長得更快。然而第二部類依賴生產資料能依賴多久？尤其是這種十足兒戲的說法對於我們的現實有什么用呢？

最後，這所指的並不是任何一個安樂國的擴大再生產，而是指正處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擴大再生產。我們在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這一點只有在工業、農業和運輸業中實行機械化大生產的基礎上才能達到。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即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方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需要。面臨着這樣的任務，如果把第二部類的優先增長說成是規律，這不是把我們的全部政策推翻了嗎？只有第一部類，只有重工業，只有機器製造業才能夠給我們提供這種技術。除此以外，社會主義和改善消費是不可能想像的。

除了這些原則性的錯誤外，海塞爾、舒伯、沃尔夫還犯了一系列方法上的錯誤。他們在論文里用複雜的數字例子和

圖表作了過分的裝飾，他們想用這些數字和圖表來建立他們的觀點。而他們却忘了：數字例子和圖表是絕對不能代替經濟分析的。經濟問題最後一定要牽涉到人們相互間的社會關係的。如果他們能從再生產理論的歷史中受到警戒，那就不會以圖表來玩弄戲法了。難道還不會利用再生產圖表鬧出事來！圖擱·巴茲諾夫斯基曾以圖表證明，消費是根本不起作用的。因此，即使可變資本減到只剩一個工人，而事情最後仍然繼續進行。羅莎·盧森堡與此相反，她用圖表“證明”積累剩餘價值通常只有在非資本主義的環境中才能實現。如果這個環境消滅了，資本主義就自動崩潰。奧托·包爾又用相反的圖表“證明”，即使考慮到馬克思所忽視的種種因素，一切仍然能够良好地進行，人們只須要正確地編制圖表就行了。而亨利克·格羅斯曼把包爾的圖表耐心地作了進一步的推算，並得出了極詳細的結論，說資本家到第三十五年，就將沒有什麼可以消費的了，加之作為積累的剩餘價值也不够了，因此資本主義必然崩潰。難道所有這些胡鬧还不够，以至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還要給它添上幾顆珍珠嗎？只要他們注意到馬克思的見解，他們是很可以省他們的臭汗的。馬克思寫道：

“圖表本身什麼也不能證明，這些圖表只能描繪過程，如果這個過程的各個因素已經在理論上被闡明了的話。”^①

海塞爾、舒伯等人方法上的第二個錯誤在於：他們企圖以圖表來規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再生產的具體條件，而沒有注意到，首先社會總產品並不是完成生產後去分配，而是在同一生產循環中分配和生產都在同時進行。因此就有可

① 馬克思：“資本論”德文版第二卷，第566頁。

能使总产品以实物的形态来生产，并和所提出的生产任务相适应。第二，他們忘了，各个生产部門从属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是有条件的。这一点只根据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产品的预定用途来加以确定。生产拖拉机的机器制造工业是属于第一部类的，但是没有多大困难就可以把它改建，用来生产小汽车，这样它就属于第二部类了。这个事实說明比例的确定能够有一定的机动性，而这点从来就不可能包括在圖表中的。

最后，在討論中完全忽略了馬克思在他的再生产圖表中所述的流通过程的条件，他早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已經闡明了他一部分的再生产理論。人們在考慮再生产理論时常常就把这个忘了。列寧也經常以市場理論或實現的理論，也就是从流通过程的觀点來研究这些圖表的，而这些圖表就是屬於這些理論領域的。

上述討論中的最大缺点是它脫离了主要的問題。再生产的主要問題对于我们來說是在于，不断地提高积累和消費，也就是扩大国民收入。在这样的觀察角度下，这些問題，如劳动生产率、节约、降低成本、利潤都成了扩大再生产的实际問題。

此外，这个討論忽略了我們是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这一事实，忽略了在我国参加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有各种不同的經濟形式的这一事实。因此我們的任务就不可能只是一般地使再生产一年一年地扩大，而必須实现这样的一种扩大再生产，即促使社会主义成份增强的扩大再生产。如果我們考察一下一九五四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完成情况，我們就可以看出，工业生产同一九五一年相比已經有了提高：

中央直屬的國營工業提高了	8.2%
地方國營工業提高了	15.0%
合作社企業提高了	8%
私營工業企業提高了	18%

由此證明，一九五四年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擴大生產占有的百分比最大，而合作社工業企業擴大生產所占的百分比最低。我認為，這種情況和我們提出的目标是不相符的。當然私營經濟在將來的年份中也將有增長。但是我們必須這樣進行工作，在一般地擴大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再生產時特別優先擴大社會主義成份中的再生產。此外，我們也必須更加擴大整個農業的生產，不僅指社會主義成份，而且也指個體農民。

社會主義成份中的優先積累首先應該是用經濟上的方法，在運用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下來達到的，這就要求改進社會主義的經濟領導方法。這些方法決定于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和自覺運用。在這方面工農國家的組織作用具有着極其重大的意義。國家的經濟機構對支配經濟規律的學習愈好，我國經濟活動的作用程度就愈大。工人階級對社會的領導體現為國家機關在經濟生活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在過渡時期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全部企業中以及各個企業中學會并不斷改善對國民經濟的領導。如果我們注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目前的情況，我們應該肯定，在這一方面的確還存在許多缺點。正是在經濟領導方面，我們還犯了許多錯誤，因而有時就使企業中的工人遭到很重的考驗。然而，我們可以而且應該肯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人階級已經證明了，他們是比資本家更懂得領導經濟的。我們已經結束了失業和危機等現象，我們建立了

令人讚嘆的工程，如斯大林鋼鐵聯合企業，卡尔貝的低熔矿爐，勞赫哈默爾大型炼焦爐和深海造船厂。我們也将更多地消灭今天在建設中妨碍着我們的这些缺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已經开始和知識份子緊密合作，掌握經濟規律，工人阶级将要这样地支配經濟規律，使新的社会制度一定胜利。

我們現在必須集中注意的社会主义經濟領導的最重要的方法是节约制度和經濟核算制，这种制度是建立在运用价值規律的基础上的。

我們在整个經濟中严格实行节约制度，当然这絲毫不限制消費。而是相反，我們节约材料、工作時間和財力是为了实现支付最少的費用取得最大效用的原則。貫徹运用节约制度意味着生产的提高并从而使消費有可能得到提高。

实现节约制度的最重要的手段是經濟核算制。“政治经济学教科書”中写道：

“經濟核算”是社会主义企業有計劃地管理經濟的方法，它要求用貨幣形式来較量生产消耗和生产成果，要求企業用本身的收入来抵償支出，并保証贏利。”^Θ

用貨幣形式來比較生产消耗和生产成果要求精确地計算消耗，即生产費用。保証贏利就要求为降低各个部分的成本而进行有步驟的斗争，这种斗争又是以对成本的精确了解为前提的。而精确計算的絕對前提是編制和使用精确的有技术根据的并且是先进的标准和其他的經濟指标。在这方面仅是机器使用标准、电能和材料消耗标准和工作定

^Θ “政治经济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03頁。

額是不够的。還必須在技術經濟的基礎上規定一般費用和流动基金的指标。在这方面我們剛要畏縮地開始工作。有一个科学工作組对是否能够在一九五五年給流动基金確定有經濟根據的標準日作了檢查。它所得到的結果是，沒有一个總管理機構是由此所必需的企業資料的。既沒有主要材料，也沒有燃料和动力原料和其它輔助材料的有技術和經濟根據的消耗和儲備標準。確定未完成的生產所需的流动基金的資料同样也很少。這些資料必須今后着手編制。而我們如果得不到經濟上的確适合的流动基金和經常費用的指标，成本計算就会有漏洞，沒有利用到的潛力就可能隱藏在這中間。標準以及一般技术經濟指标是經濟核算的核心。

在計算成本中也还有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的經濟科學工作者應該加以研究。例如，海慕特·克里姆根據費用超過時負債的原則研究了費用分裂的問題。得出的結論是：

“在實施中，按費用把不負債的超過費用分出來，變成了其他部門的負擔，這是很成問題的，并且不論從工作觀點還是從理論的考慮出發都是不能加以提倡的。”^①

應該承認，從工作觀點出發，這個事情是不簡單的，但是從理論觀點出發是不能同意克里姆的意見的，如果他根據他的論述而得出結論是，計算由於工作原因而產生的廢品負擔不管所有前面的生產階段，而是直接算在促成產生廢品的階段的帳上^②。克里姆應該說“發現階段”而不應該說

① 海慕特·克里姆：“社會主義工業企業中的費用和費用分析的問題”，“經濟問題發言”，第16期，第35頁。

② 同上文，第93頁。

“促成阶段”。这个發言的意見是，按克里姆的例子來說，有一塊鋼錠，在高質鋼軋工廠里被確定作為廢品了，但人們並不把它認為是煉鋼工人的廢品，而是把它叫作高質鋼軋鋼工人的廢品。煉鋼工人甚至還可能因為這個廢鋼錠而獲得了獎勵。這至少在理論上是很明顯的了，這樣的實際情況是違背了按勞分配的原則的，應該促使努力尋找另一種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蘇聯的經濟學家也在研究這個問題^①，這說明了，在這方面的確存在着問題，我們不應該由於“從工作”考慮而忽略了這個問題。

經濟核算制的目的是要使國營企業獲得或提高利潤。利潤即企業的贏利，是由成本和銷售價格之間的差別中產生的。另一方面，材料等等的價格本身都是成本的一個構成部分。因此一種正確的價格政策對於達到真正的利潤是具有非常意義的。

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的決議中要求，“整個價格的形成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因此價格的決定必須建立在“運用先進的有技術根據的標準來精確計算成本的基礎上”。根據這個決議應該逐漸地減少高額的價格補助，特別是基本原料的。這樣，在一九五三年煤、焦炭和有色金屬的價格就提高了。在這時所實行的人民必需品價格的降低證明了這些價格的提高對於消費者沒有壞的影響。隨著當時價格的變更，向着利用價值規律整頓我國的價格制度邁進了第一步。在冶金業中制止了價格上漲。這時就為邁開下一步和根據成本重新調整煉鐵工業的銷售價格創造了條件。當然提高基本原料

① 海慕特·克里姆：“社會主義工業企業中的費用和費用分析的問題”，“經濟問題叢書”，第16期，第36頁。

价格以使价格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只是一个一次的措施。从而就为有关部门争取降低成本获得利润的实际斗争创造了条件，使以后降低价格有了可能。

价格在计划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确定正确的比例以及确立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不同成份之间的关系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实际情况也已经告诉我们，在规定价格时不充分注意价值规律，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发生坏的影响。

例如由机器制造工业部一九五四年第三四一号命令规定提高价格妨碍了投资计划的实现，并且使价格政策陷于混乱。但是它却使有关的机器制造企业获得了不正当的超额利润。在其它的价格形成时必须防止，生产者能够通过自由地确定他们的产品价格而提高他们企业的利润，因为这是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而达到的提高利润。要使利润得到真正的提高，唯一的办法是争取降低成本。

目前在规定农产品价格时对于价值规律的注意是很不够的。采购价格常常低于成本，而收购价格却超过成本几倍。这些价格到目前为止还表现为提高农业生产，特别是畜产品的有效的杠杆。但是逐渐地出现了一些不平衡的情况，这种情况起着有害的影响。例如牛奶和猪肉的价格订得很高，但是通过价格来鼓励饲养小牛、种植蔬菜及其他却很少。这对于生产重要的农产品起了阻碍的作用。

在其它的价格形成时应该准确地研究各类价格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比目前更多地利用价格来作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基础上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经济杠杆，并努力达到在规定一切价格时尽可能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当然这不能说一切价格的规定都是符合于价值的，而是说适应

价值規律的基本作用。利用价值規律就可以精確地確定成本，而規定價格是以這個為根據而有計劃地適應當時國民經濟的任務進行的。

利用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和改進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經濟領導方法的目的，是使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得到日益廣泛的發展。從而保證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地增長和不斷地完善，並且經常改善滿足勞動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通過我們根據這樣的精神堅持不懈地工作，我們証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經濟比較西德資本主義經濟要優越，從而使得德國人民的偉大目標，即恢復德國的統一，使德國成為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獨立和強盛的國家得以早日實現。

經濟和思想

最後我們談到這個問題，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經濟發展如何在意識和思想的發展中反映出來。我們必須確定，思想意識的發展是落後於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的，但同時我們也可以說，在經濟科學方面近年來是有某些改進的。的確，要克服脫離生活的、猶太法典家“理論”的傾向還早。然而我們的經濟理論工作者已經非常注意實際的問題了。我們在經濟科學方面已經有了生氣。前幾年在我們共和國出版的大量的經濟科學著作証明了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出版社的“經濟問題發言”集編的出版。在這些主要是由比較年青的經濟學家寫的著作中，大部分是真實地研究了我們經濟建設中的迫切問題的。在這些著作中，許

多作品的缺点只是在于，作者在許多不必要的情況下用了复杂的計算表格和圖表過分裝飾了他們的敘述。因而不仅使工人，而且也使大部分做實際工作的經濟工作人員不能閱讀這些著作，而使這些著作失去了作用。我一點也不想爭辯，政治經濟學的比較高級的數學是可以起巨大的輔助作用的，但是我們在研究理論的經濟問題時絕不應該忽略對於我們有關係的是我們的理論知識的實際適用性。這種適用性只有在實際工作者懂得了這些理論工作者的語言時才會產生，而且，如果這些今天很熱心地在從事研究經濟問題的先進工人們也能夠從我們的理論工作者的著作中得到益處的話，那末它將更為有效。

此外，近幾年來還出版了“經濟科學”雜誌，在這本雜誌中研究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及西德的許多經濟理論和實踐的問題。最後，德國科學院已在柏林建立了經濟科學研究所，並且設立經濟科學部門作為經濟研究工作的中心。

經濟科學領域內最大的缺點仍然在於，沒有能成功地進行關於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廣泛討論。的確，在這個領域內已經有了开端，但是我們沒有超過這些开端。在這方面進行這些討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就如來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關於勞動生產率的討論會，關於工業總產量的計算的討論或關於工資問題的討論所證明了的。但是這些討論大部分還是限於很狹的範圍，它們都中斷了，說得好点儿，它們都睡着了，沒有得到一個結果。討論經濟問題的討論會和其它會議舉行得也太少。因此我們必須大大改進我們這方面的工作。

也應該肯定，我們的經濟科學和經濟實踐之間的關係要改善的地方還很多。我們在這方面經常用脫節代替了緊

密联系。理論家和实际工作者之間還沒有活躍地交換意見，沒有真正的合作。我經常觀察到，經濟工作者从理論工作者的著作中得到的知識很少，他們沒有注意這些理論著作，因此在他們的工作中也就不能利用它們。我只想舉一個例子說明。在一九五五年出版了古爾特·台希曼的著作“國內貿易經濟學”。這本著作應該在我國商業機關的工作者人員中掀起活躍的討論的，因為它為此提供了很多的原因。關於這個問題我問了我國商業機關中的許多領導者，但是這些人中大部分連这么一本著作已經出版了都不知道！也有這樣一些例子，例如某些問題，如勞動生產率的測定問題，經濟科學工作者已經解決了，但是直到目前還沒有由此得出實際的結論。我們必須想出辦法，以使在經濟領域中的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之間達到更緊密的合作。最近在這方面出現了一些好的傾向，希望事情得到徹底的改進，因為我們的經濟工作者現在正開始努力研究“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過渡時期的任務的解決當然不是經濟理論工作者一方面，也不是實際經濟工作者另一方面的事情。這是廣大群眾的事情。人民大眾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決定力量。只有通過他們的勞動才能完成計劃。在群眾性競賽中貫徹了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的規律和節約制度，因而提高了利潤。在群眾競賽中克服了落後的思想，這種思想在我們這裡常常從西方得到新的養料。然而這種克服不會是自動進行的。正因為客觀上意識落後還存在，思想啟發工作和反對落後認識的思想鬥爭就更加必要。因此經濟科學宣傳在目前我們過渡時期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國營企業中的工人現在正渴望經濟科學的啟發。他們

在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全体大会后成千成万地轉向鑽研經濟問題。于是就發展了一种劳动的新形式，像国营企業中的經濟會議。一九五五年二月底德国統一社会党卡尔·馬克思城国营摩杜尔工厂的党组织举行了第一个这样的會議，在这次會議上工人、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对提高企業利潤的問題进行了討論。

在我国社会主义企業中又有了一种新的情况产生，特別是对经济学家提出了高的要求。经济学家目前最主要的是要通过广泛地宣傳經濟科学知識來帮助促进群众在經濟領域中的創造性活動。他們必須联系到工人們所在的企业的情况，來說明社会主义經濟規律的性質和作用。对于这一种工作來說，“政治經濟学教科書”是一本可靠的入門書。我們現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充分利用总结在这本教科書里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向群众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具体任务，以及他們的企业中的具体任务在理論方面和實際方面講解清楚。經濟科学工作者通過在企業的宣傳工作，一定会使得他們自己的研究工作更加有效果，因为在这种情況下他們会从我們的經濟工作的實踐中吸收更丰富、更深刻的知識。

我們永远要記住这一点，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科學并不是教条，而是我們行動的指南。我們与实际联系得愈緊密，我們就会使科学同人民大众的合作愈巩固，我們将会更順利地解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渡时期的任務。

